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政府如何偿还公共债务?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虚无之境的性荒诞 新井一二三的游记 奇异的私人演出协会 昆明访书记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 ──专访刘再复

"决非偶然之事" ──哲学与公共生活





致力士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灵 子

观察员

写作: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海(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北京)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

扬 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 舞(北京)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细则

- O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O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 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 的批评。
- O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O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 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 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 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他在特有的孤恃外, 更有他特有的天真, 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

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

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

一九九一年,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曾如此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 谨借此献给所有在焦躁困扰的当下仍能安心阅读的读者。时事如何纷扰,终 有文字安慰人心,这些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思考交流,让人知晓吾道不孤,

尚有可待。

勘误:

- 1)上期"视觉"文章《海报上少了一个人》中,"几十匹马组成一个方阵,上面骑着古装的士兵","士兵"应为"农民工",特此勘误。
- 2)上期第35页的图片注释应为雅斯贝尔斯,特此勘误。



目录

封面用图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Pablo Picasso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写作•朱白朱航满

思想●成庆

社 会 • 夏佑至

文 史 • 王晓渔

001-021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英格兰 ● 孙骁骥

政府如何偿还公共债务?

022-024

书评

• 刘 柠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 朱白

虚无之境的性荒诞

。戴新伟

新井一二三的游记

025-034

随笔

• 马慧元

奇异的私人演出协会

。戴新伟

昆明访书记

035-041

访谈

• 灵 子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 ——专访刘再复

042-051

译介

• 吴万伟

纳斯鲍姆:

"决非偶然之事"

——哲学与公共生活

052-065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过去一个月,有关我的读书生活,大 概有三件事,是值得陈述一下的。第一是遇 到了我热爱已久的应星教授。应先生看上 去有些木讷,不事修饰,声音细小,说话留 有余地,对他人的言辞,持倾听状。我们是 为他的一本新书《"气"与抗争政治:当代 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1年3月)才坐到一起的,见 得面来,他就连说几声感谢,讲的是他以前 的一本旧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 书店,2001年1月),几年前戴新伟先生吩 咐我读这本书,我才第一次发现这个时代, 竟然还有应星这样优秀的社会学家,当时 就写下了书评,还被诸多媒体转载,算是跟 着应星先生的大作,把我自己传播了一把。 应星笑着说,他拿得出手的三本书,第一本 就是这本故事,不料却是一本禁书,似乎到 现在还没解禁,第二本是《村庄审判史中的 道德与政治: 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 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6 月),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第三本就是这本 《"气"与抗争政治》,稿子成型有一段时 间了,但好多出版社却不敢接手,因为事关 社会稳定问题,都怕惹上麻烦。

某种意义上,应星教授的这本书,算 是一名社会学家试图挣脱西方社会学解释 系统,用中国传统语境来解析中国问题的



一次小范围的努力。"气",这个并不清晰的社会概念,被他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学术定义,并作为一种视角,进而将问题带进一个体系。从结果来看,教授的批评力度当然是持续的,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普遍被运用的所谓维稳技术和策略,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会给社会带来复杂的后果。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官僚集团与乡村政治,都在"气"这个领域握有基本的材料。如果沿着这种视角,真正缓解维稳的压力,形成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破除僵硬的、教条的维稳体制,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依然是案例式的叙述,甚至是故事式



的结构,应星的文章似乎从来都是脚踏实地,这使得书读起来并不枯燥。所以,坐在他的对面,想起他书里的风景,我的心里生出了一些别的念头,比如好文章应该就是由这样朴实的人写出,如我这样迷恋虚荣、举止做作的人,想来是写不出结实、好看的锦绣文章的。

第二件需要讲述的读书生活,是我和体 制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央行货币委员会专家 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院夏斌 先生,有过一次还算恳切的长谈。我们的话 题,围绕着他的新书《中国金融战略2020》 (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展开, 这当然是 一本宏大叙事的著作,但不乏对中国当下金 融问题的直言。他笑着跟我说,建设性的批 评,是他这些年立足学术圈的方法。他曾经 开玩笑一般向最高官员建议, 把人民大会堂 变成股份制公司,20%的股份卖掉,服务员 一个不下岗,安全保密,一切照旧,会议体 系照常,一切都不影响,出售20%的股权所 拿到的资金, 马上进入消费环节。场面似乎 还算融洽,官僚笑而不语,其实当时夏先生 还想说, 即使您不这么干, 早晚也得这么干。 国有企业的份额太多了,这既阻止了市场的 竞争,也浪费了大好资本。

无论如何,夏斌都是一个极有趣味的 学者。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和资料,非常凌乱,看上去没有秘书帮他打理。 惟一的绿色,是窗户边上的一颗巨大的仙 人掌,足足有2米高,表明这个办公室的主 人,虽然身处各种纠缠之中,但思想的指向,却是倔强的。

以夏斌的年龄,他属于红卫兵一代,如今却成功转型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样的人生轨迹,注定使得他的思维模式里,既有国家主义的宏大思维,也有金融学无处不在的工具理性。既有自由开放的经济学意识,也有对国家特色的不断陈述。既有对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展望,也有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深度把握。

夏斌显然不是那种象牙塔里的纯粹理论经济学家,他说自己一直站在国家的土地上思考,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肯定是国家主义路径。有一次,他说起美联储的各种政策,说起这些年美联储发放的天量的美元,说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像所有崇尚理论趣味的经济学家一样,把怀疑和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政府的货币政策上。不同的是,他回忆起有一年他到美联储的地下室参观,他看到了摆放在那里的一排排的黄金,那种金黄的颜色,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

他的意思是说,他比谁都懂得金融领域的金本位效应。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美国人的底气,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没有人能真正把自己抽离出来,将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放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观察,思考并行动。每个人的行动都有长期和短期的考量。在长远的角度看,夏斌显然深深赞同一批自由主义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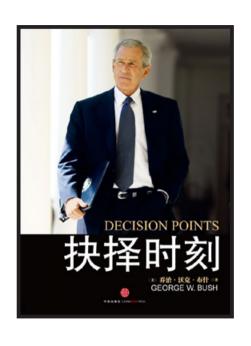


学家的怀疑与批评。但是夏斌说,生孩子 是一个具体的工作,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 怎么能理解肚子的疼痛呢?

第三件读书事件,其实算不得事件, 是我仔仔细细读完了最近出版的小布什传记《抉择时刻》(乔治1布什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为什么要专门说到这本书,原因是小布什的基督徒身份。这几年我个人范围内的信仰生活越来越坚定,有关对人性的绝对怀疑,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对自由秩序的终极理解,似乎正在形成一个体系。在这样的意义上,小布什的个人生活,以及基于他个人生活构建起来的价值观,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案例。如此,我才愿意多说几句,甚至想在这里主要解读这本书、这个人。

关于布什总统,我说的是那个永远像一个大男孩的美国人George·W·Bush,小布什,在他长达8年的总统生涯中,总是带给这个世界莫衷一是的话题。有人说他是自由战士,有人说他是战争魔鬼,有人说他是市场的守夜人,有人说他把人类的经济带到了悬崖的边上。甚至有人说他可爱极了,而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个傻瓜。我遇到过一名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他说起小布什,也是一脸的鄙夷,说这个不靠谱的德州烂仔太不成熟,几乎要把美国人的家底糟蹋光了。

如今繁华落尽,只剩下故事,和与故事有关的情绪。中国有句聪明的成语,叫



做买椟还珠,我的意思是,面对小布什,可 能我们都是那个买了美丽盒子却丢了大好 珍珠的傻瓜。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越过 小布什那些缤纷的故事,去读懂他内心的 风景呢? 许多年以后, 我想小布什还会愿 意回忆2005年1月20日的场景。他说那一 天天气晴朗,世界看上去色彩斑斓,人们 的面孔,美丽又清晰。他和妻子劳拉站在 一起, 劳拉手持《圣经》, 翻到以赛亚书的 第40章第31节。上面写道,"但那等候耶 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 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当然是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小布什将 左手放在《圣经》上,举起了右手。首席大 法官抱病主持仪式,布什开始祷告,他祈 求上帝帮助。接着是21响的礼炮,以及一 家人深情的拥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小布什的就职演说 词。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对遥 远边境严加把守, 捍卫我们的自由。前苏联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我们也度过了一段 较为平静的岁月,如释重负,休养生息,直 到有一天,战火燃起。他还说,我们已经发 现了自己的弱点,也找到了根源。只要世界 还有地方仍在遭受着仇恨与暴政的煎熬, 只要那些地方的意识形态认同而且滋生仇 恨、放任杀戮,流血冲突就会愈加严重,最 终变本加厉,导致巨大的毁灭,甚至冲击我 们严防的边界,对我们产生致命威胁。

只需要一点点实证的勇气,人们就能 发现小布什总统的话, 只是说出了一个客 观存在的事实。由此,他坚信,只有一种悠 久的力量,可以冲破仇恨,将暴政打回原 形,给正义和宽容的人们带去希望。这种力 量就是人类的自由。

显然,自由成为布什思考和行动的最 高目标, 也是他行动的方法。在某种意义 上,这甚至是他的视野,他的事业,他的历 史,他的当下和未来。所以他继续说,历史 事件和常识一直在引导他做出结论,自由 能否在我们的土地上生存,愈加取决于自 由能否在其他土地上生存。对于世界和平 的最大希望, 寄托于全世界自由的壮大。由 此,布什的决心无以复加的坚定,他要支持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主运动,用每个人的





权利与尊严去阻止全世界的所有暴政,并认为,这才是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

对于一个长期持有腹地意识的传统中国人而言,理解布什的价值观,非常有难度。而最粗糙的解读方式,则是将他的思考和行动,理解为一种强权,一种侵略。这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落差,在对人的权利与自由的理解上,我们有着浓厚的家族意识、民族意识、身份意识和腹地意识,以至于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之后,这种挥之不去的家族、民族、身份和地理意义上的腹地传统,终于把我们每个人具体的生命与具体的个人自由权利遮蔽了。个人的自由变得不再重要,尤其是当地理意义上的家国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党派,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出现之后,个人迅速成为碎片,自由荡然无存。

但对于布什这样的基督徒保守主义者 而言,人的自由和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且 在可以目及的范围之内,每个人的自由权利 无疑是平等的。不理解这一点,人们永远无 法理解为什么布什要将自由理念输出到这 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要让遍地的居民 得自由,永远理解如特蕾莎修女这样的欧 洲人,为什么要来到遥远的东方印度,去关 心那些和她本来毫无关系的穷苦人。

甚至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很多中国 人可能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年的英国 人一定要来到中国做生意,要给古老的中 国带来自由贸易的理念。在他们看来,亚 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是一种从上帝而来的信念,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即使中国人也不能例外。可是中国人无法理解。跨越千年的封闭意识,和地理意义上挥之不去的腹地思维,让中国人对任何跨国性的经济行为,成为一种禁忌,似乎只有守土卫疆,在一国范围之内自力更生,才是中国人最美好的选择。

感谢一种世界性的交流与融合,虽然 每个人都是利益的载体,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是经济学或者说人类学的 美妙就在于,当每个人或者每个国家都在 追求一种利己的生活,但基于自由交换的 原则,以及基于自由交换的成本方式,人们 所有的利己行为最后都构成了一种利他主 义。至少从国际政治最近100年的历史来 看,美国人或者说亚当·斯密真正的信徒们 首先享受到了这种自由无国界的好处。这 方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

这正是布什的信心所在。他在日本、 韩国、东欧这样的地区看到了自由的力量。最优美的案例当然是日本,9·11事件之后,最先向布什表达慰问并支持的人, 并不是英国或者是法国的领导人,而且美国在二战时代最大的对手日本。很长一段事件,布什每每提及这一点,都止不住地感慨。60年前,他的父亲老布什总统曾经是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曾经被日本人击落,老布什曾经一个人在大海上靠着救生衣漂流,几乎九死一



生,能够活下来惟一的勇气,来自不停地对着上帝祷告。而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在当时当地,则在日本帝国政府担任高职,是老布什总统真正的敌人。谁能想到呢,许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们却能携手合作,维护人类和平。

这样的变化太让小布什感叹了,他不得不赞美上帝,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这一切都是自由的方向。是人类对自由的渴

望,让当年的对手,如今共同成为自由的守望者。

好吧,说得已经太多了,尤其是我的信仰。事实上,信仰才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个体建设,与他人无关,我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絮叨,刚好是与信仰的私密性冲突的。看在那些闪烁的公共问题上,各位,你们就姑妄听之吧,我也会有所节制,尽量守住个人的边界。Q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人类都有窥视癖,也不用给自己找各 种恰当理由,窥视癖几乎是人类史上的 一枚从始至终的标签。窥视归窥视,放在 公共话题下谈论则要讲究分寸, 粗鄙与有 趣可能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看《窥 视厕所》(妹尾河童 著,林皎碧、蔡明玲 译,三联书店,2011年6月)并非完全是因 为满足猎奇,里面还有从容淡定的描写,以 及不同寻常的细致入微,而这些颇具文学 性的文字竟然出自一名舞台设计家。生活 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独特的一面,观察 家们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对我们的生活洞 悉过无数个细枝末节,将它们组装在一起, 就是逼近真实的完整生活。日本舞台设计 家妹尾河童这次算得上独辟蹊径,他将目 光凝聚在人们每天都要进出数次的厕所。 他将日本的48位名人家庭厕所作为自己的 样本,仔细勘察和询问,用设计家的眼光进 行解读。美术家、音乐家、建筑师、赛车手、 文化评论家、探险家、演员……他们对厕所 的看法和种种怪癖,还有对厕所的独特记 忆,都是妹尾河童在这本书中展示的。

对经典的念念不忘有时候只是出于一个场景,甚至一个画面、一个微笑、一个瞬间的声音。《邮差总按两遍铃》(詹姆斯·M·凯恩 著,主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6月),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46



年泰·加尼特导演的同名电影里的拉娜·特纳,她在片中美得让人无话可说,甚至"让人窒息"这样肉麻的词用在她身上也一点问题没有。《邮差总按两遍铃》原著本身是英语文学史上的名著,故事非常简单,见色起意、图财害命,谋杀的情节也简单到仅仅是符合日常逻辑而已,但值得一说的却是詹姆斯·M·凯恩讲故事的方式。他永远不动声色,笔下的人物在冷冰冰的场景里发生了一些冷冰冰的心念和行为,悬念、动机、情节却都是在持续加温,阅读起来也自然是拿起来放不下。也许凯恩掌握人类阅读时的一种律动,他看似平淡却笔笔击中这种律动,将节奏成功灌输到读者的大脑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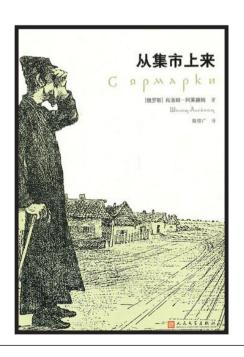


书曾经出版过一次,这次重新翻译是一种还原,质感更好、品质更佳。

华语作家一直让人提不起劲儿,这几 乎是长久以来的"常识",但我们却要一再 去说,一来因为作为母语很难不去关注,二 来有时候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不正是 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吗? 只不过长此以往除了 败坏胃口,也没别的意义了。所以推荐好的、 值得一说的作品,才应该是常态。难得最近 有这样的作品问世。韩东一直我我喜欢的的 作家,他是诗人、小说家,同时跟很多作家一 样,在大部头之余他也写专栏随笔。《幸福 之道》(韩东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8月) 收录了近百篇韩东近年来的随笔作 品,这些报刊之作看似随意随性,但却包揽 万物,可以看做作者人生历程的结晶和文学 之路的延伸品。同时结集出版的还有《夜行 人》、《一条叫旺财的狗》,它们既是一位诗 人以近似乎挑剔的眼光看世界,也是一名 小说家以敏锐洞察力剖析世事的集合。韩 东不缺乏敏锐,但他并不急促,更不宣泄愤 怒,他总是慢悠悠温和地告诉你人生如何 不规则以及世事多么操蛋的本质。

还有一本是我个人期待已久的《晚来 寂静》(李海鹏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版),从很早之前我就是李海鹏 的读者,从《做天才》到新闻作品和随笔。 这是他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内容涵盖一个 人的前半生的经历,颇有自传色彩,所谓一 草一木皆有生命含义。网上喧嚣太烈,很多 人把作家作品当成潮流来看,大家愿意做的是点到为止的体味,而不是亲身去经历,所以与真正阅读一本书相比,人们更愿意做的是弹或赞。这本书我看了一半,毫无疑问是杰作,很多关于作品之美、作家之优质的评价当之无愧,从语言到意识,李海鹏是天生的作家,且还是那种永远牛逼哄哄吊儿郎当的作家。他是那种对读者有所要求的作家,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作家很会讨好人,也更会得罪人。只是我不觉得一个作家有必要对自己的作品解释那么多,如今微博等网络形式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却令一种本来只能存在于"隔膜"才会有的韵味,几近消失。

当一个人心怀幻想,然后再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幻想一次次破灭,经历绝望、 感受悲伤时,他也许再将目光凝聚起来,





会看到周围跟他一样的人比比皆是,所谓 悲伤、破灭就如同"从集市上来"的一样。 阿莱赫姆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这本小说 中,繁杂多彩的世界,一面成为胜利者的 最具诱惑的目标,一面也成为失意者的绝 佳映衬,阿莱赫姆小说中流露着浓郁的自 传色彩,他笔下的人物像士多店里货架上 令郎满目的商品,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带着呼吸的真实人物,是人类生命构成的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同样是一本自传性的小说《从集市上来》(肖洛姆·阿莱赫姆著,陈珍广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6月)更为光怪陆离,情节的起伏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悲伤与绝望。Q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越胜文 集《燃灯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年),我早就想读。北京万圣书园用于图书 推荐的玻璃书橱中,曾存放有这册装帧朴 素淡雅的著作,我恳请书店的工作人员为 我打开橱柜,大致翻阅了一下,才知道其中 仅收录有三篇文章,其中长文《俪歌清酒 忆旧时》曾在北岛主编的著作《七十年代》 (三联书店, 2009年7月) 中读到过。幸 运的是, 近来我偶然翻阅学者丁东主编的 《先生之风》(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 月),又读到收录在《燃灯者》中的另一篇 长文《辅成先生》,此文将近50个页码,在 全书中篇幅最长,也安排得最不醒目,尽管 编者在文章的附注中声明此文已进行过必 要的技术处理,但我读完这篇文章,也还 是感到有赵越胜的这篇文章存在,《先生 之风》这册文选才显得分量十足,不虚一 读。如此,《燃灯者》一书,我已读过大多 半,虽还有遗憾,但总算不那么急切地朝思 暮想了,也不再因为错过一册难得一遇的 好书, 而那么耿耿于怀了。为此, 我要感谢 北岛和丁东这两位编者, 也要感谢出版这 两册选集的出版社。

赵越胜的《辅成先生》充满着一种厚重、沧桑和忧伤的气息,它将一个晚辈学 人在时代动荡之中对学术前辈的理解与感 怀,书写得分外动人。文章中的辅成先生 乃是北京大学著名的伦理学教授周辅成先 生,他与赵越胜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忘 年之交,而维持他们师生之谊的,不仅仅 是那种师徒之间的学术关联, 更有他们在 精神与道义上相同的理念与追求。我很喜 欢赵越胜的笔触,他将一个曾受大辱的寂 寞学人,写得那样高贵与透明,那非得是大 手笔,也非得是历经沧桑的人不可。除了这 篇《辅成先生》,丁东主编的《先生之风》 中,我最喜爱的还有章诒和的《人生不朽 是文章》,这篇文章同样厚重。章诒和的文 笔总是那样动人心扉,而她的个性气质与 她在荒谬的历史岁月中遭受的种种磨难, 同样给她的文章留下了批判与怀疑的底 色。她在这篇文章中写了曾任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和中国戏曲协会会长的张庚, 这个从延安时期走来的革命干部, 浑身激 荡着正直、善良与高贵的人格魅力,他在学 术与官场之间平衡了半生,但做人与为学 的底线, 却从来是那样牢固和笔直。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大多数文章都在北岛主编文学刊物《今天》上发表过,这些文章基本都保持了原来的面目,也有些经过一定删节发表在内地的的刊物上,诸如《画事琐记》一文首发于《今天》杂志2004年1期,后又经删节刊发在北京《读



书》杂志的2004年第8期和第9期。许多 读者包括本人在内,基本上也是从《读书》 杂志上了解到高尔泰的这些文字的。尽管 有所删节,但传播的功能还是远比海外的 刊物强大,其他的书籍杂志,诸如《谁令 骑马客京华》最早就刊发在北京的《读库 0601》丛书上,但也做了比较大的删节。 高先生的这册《寻找家园》现在已经共出 版了四个版本了,其中2004年由花城出版 社出版的简体删节版《寻找家园》,2009 年11月由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出版公司出 版的繁体字版《寻找家园》,2009年10月 由美国Harper Collins 旗下的Ecco出 版的英文版《寻找家园》,书名翻译为 In Search of My Homeland: A Memoir of a Chinese Labor Camp, 最后一个是 2011年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的 《寻找家园》(高尔泰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2011年6月)。

我有幸将花城版、印刻版和十月文艺版都读过一遍,发现几个版本的差异非常之大。前些日子,天气炎热,无心读书,便对这册书的版本进行了一下案头对照,想看看这些版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差别。案头做了几天功夫,写成了篇很可能无法发表的文章《<寻找家园>版本记》,但终于也明白,今天在中国做编辑真是不容易。以这册十月文艺版本的《寻找家园》为例,其中第三卷不但删去了三篇文章,而且删改之处很多,基本上都高达十几处,诸如《自序》



一篇直接删改处便达到了15处;《杨梓彬》一篇,几乎是面目全非,涉及到作者个人观点表达的部分,几近全部改写,有些内容的意思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让人产生若不读原文,真不知所云的感觉。

因为出版的语境,进行必要的删节,甚至是部分的删改,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比作者的原文,发现十月文艺的修改有的已经到了十分残忍乃至是荒唐的程度,如果阅读和进行研究,这个版本都很可能会误导读者的,有的甚至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乃至匪夷所思。这里略举一例,诸如《天地空白》一篇,作者写到他在敦煌认识李茨林后,两情相悦,十月文艺版随后便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决定结婚时,'文革'已经临近。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反革命的女儿,很引起注意。"但我对比了台湾印刻



的版本,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原文则是两 段话,分别为:"几个月后,我向她求婚。我 说我比你大十一岁,一无所有,但很爱你, 你可愿意做我的妻子?她说,那多好呀!停 了一下,又说,有了你,我就什么也不用怕 了,多好呀!我心里咯噔一下,自问有能力 保护她吗?倘若没,有资格追求她吗?她望 着我,说,你怎么啦?我说了我的想法。她 说她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我们要分开。 我说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世界 吧。""没见到她的父亲,他已经被遣送到 边远的农村,管制劳动。她母亲也是基督 教徒,极有教养,很慈祥也很能干。她说等 孩子们有了着落要申请去照顾丈夫。居委 会讲阶级斗争,正动员她划清界限。我同 她们家往来,也很引起注意。"如果不读原 文,会发现删改的版本十分突兀,也有失简 单,而作为读者,我也实在是不知道这两段 话有什么太大的不妥之处,即使有个别字 句需要删节,那么可行的处理办法就是换 一种近似的说法,而决不是大段大段地删 除呀。

对于读书,自己的心态常常是有总比没有要强。因此,即使十月文艺如此删节,我还是庆幸它能够再度增订出版,只是若想更深入地理解高尔泰先生,我倒是建议去读印刻版的《寻找家园》,或者找他最初在《今天》杂志发表的版本来读。余世存的《非常道II》(中信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之后,北京一家报纸请我对余先生做



个访谈,但访谈做好了,那位编辑老兄却急 急如令说,余世存的访谈不能用了,可惜其 中有些内容还是颇为精彩的。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我问他在这册书中遴选材料的标 准是什么? 他说自己也没想那么多, 觉得有 些东西触动了自己的内心, 觉得对于自己 更有价值便收集进来了。再如,他说要尽量 保持材料的客观,让读者对历史去判断, 但我发现其中有个史料,形容赫鲁晓夫是 个小丑, 行径可耻, 带有很大的个人情绪。 余世存说,这条材料可能是自己没有处理 好。余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我觉得他对于 《非常道》和《非常道II》的理解,很让人 尊敬,这些材料就像是一条条线索,让你 去发现其中更多的秘密,这也才是这两本 书的真实动机。

最后,我要推荐批评家李静的评论集 《捕风记——九评中国作家》(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1年6月)。李静是我非常尊敬的 一位文学评论家,我尊重她对文学非常纯 粹的态度,自从第一次读到她的文学评论, 我一直都在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当代很多 文学评论家,在没有成名之前,都与所谓的 文坛或文学界保持着一种苛刻的距离,但 一旦成名成家,便立刻投入到其热闹的漩 涡之中去了,参与评奖,担任评委,参加毫 无意义的研讨会,写应景文章,甚至是拉帮 结派,令人生厌。但李静从来都很低调,写 着自己的评论文章,也坚持着自己执着的 美学判断,诸如对于王小波和木心。两年前 我在一个短论中有过这样的读后感想,抄 来结束这篇报告:"李静的批评文字,在当 下中国的文艺世界里实在是一种异数,这 册文学批评集让我集中看到了一种犀利、

华美、丰富与细密的文学风景, 而她试图超 越文学写作来获取甚至构建一种自由与智 慧的精神世界,则让我看到了当下文学批 评写作的一种可能与希望。在李静的精神 世界里,华美与自由的极致是木心,而精神 的自由与智慧则要首推王小波,因此她对 这两位作家的评论也最让人读之心动。从 这两个当代文学人物的精神纬度,也可以 见出作为一个评论家, 其构建自我精神世 界的重要与关键,而她对于王安忆、贾平 凹、莫言等文学人物的批评意见,则显示出 批评家绝不流俗的思考意识,以及对世俗 及传统文学观念敢于抗衡与割裂的独立姿 态。因此,读李静的文字,常让我对自己的 写作产生一种参照,使得我不再轻易和散 慢的书写与聒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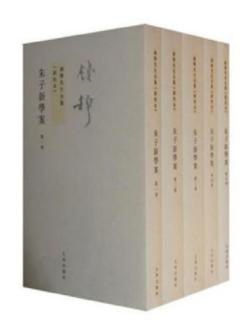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g@gmail.com)

近些年,国内谈中国文化复兴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着实不少,甚至许多人认为非"中华文化"不能救中国,不能"正人心",不能"正国是"。泛泛而言,我并非不赞同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与学习,但奇怪的是,今日谈重振传统文化的一派与反对一方,似乎都无兴趣对"中华文化传统"作一番耐心的梳理,往往一谈传统,就落入某种想当然的先入之见,似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根明确的"道统"红线,绵延不绝而下,这种视传统文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作法,笔者不仅不敢苟同,而且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了。

首先还是介绍新书吧,这里先要郑重 地推荐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九州 出版社,2011年1月),钱穆先生著作的单 行本这些年出版了大部分,但这本非常重 要的《朱子新学案》自从巴蜀书社在1986 年发行过一版之后就再不见踪影,如今终 于收入九州出版社的《钱穆全集》,当是功 德无量。

朱子自然是儒家思想史值得一而再、 再而三研究与讨论的人物,余英时先生前 些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 店,2004年8月)就曾引起学界的激烈争 论,足以说明如今关于朱熹的研究虽然成 果寥寥,但他却是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甚



至可以说,如何评价朱熹,关涉到如何评价 宋以降的儒家思想的地位与角色的问题。

大家一般会认为,朱熹自然要被归于儒家思想史的系谱之中,不过从具体的思容来看,朱熹实际上混杂了佛道思想,如秦家懿先生就曾在《朱熹的宗教思想》(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朱熹与佛教思想的关联,而这种儒释道三家杂糅的局面,直到近代以来,仍未大改,如王汎森先生就十分强调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三教杂糅与竞逐的特征,陈来先生近年来也注意到新儒家与佛教之间的交涉。

那么,就宋儒而言,儒家在心性论与事功方面,到底是独成一格,还是与其他非儒家传统杂糅相济,本身就是思想史有待深究的地方。周敦颐吸收道家,二程参照佛家,



朱熹则广收佛道二家资源来为儒家奠基,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儒家自身果真是一自治且自足的思想传统?或者说,儒家的道统角色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因自身对政治的立场而"制作"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关于儒家的政治立场,"大一统"无疑是公羊学一路的显著标志,事实上,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看法,"大一统"是儒家"正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一方面视儒家的文化道统为合法性,一方面也视疆域的统一与华夏文化的普世化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杨向奎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中就高度赞扬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 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 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 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 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

"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我国人民 具有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 力量。它要求人民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 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 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 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 境界,这种境界具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 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 级差别,是谓"大同"。 尽管杨向奎先生并未视"大一统"为 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毫无疑问,他的"大一统"仍然延续了"夷夏之辨"传统,独尊华 夏文明。不过在今日传统崩塌的状况下,何 谓"华夏文明",本身就是一值得深究的问 题。何况今日基督教、佛教、儒家纷纷重振 旗鼓,未来假如"华夏文明"试图再次立足 世界,那么到底会以何等面目出现?

关于这番"中国崛起",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早在数年前就已有察觉,他在《中国的冲击》(王瑞根 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7月)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到:

昔日由"西洋的冲击"所引起的日本 鹤立鸡群的抬头与中华文明圈从历史舞 台上的消退这一我们头脑中的历史,现如 今,由于受到"中国的冲击"已经开始翻转 了一一这一冲击是钝角型的、难以被察觉 又难以图表化的、犹如肚脐上方的腹部找 到拳击似的、虽缓慢却很强烈的冲击。

沟口先生显然没有预料到是,今日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论"与"中国震撼论"已经甚嚣尘上,不过或许持此论调者也并没有意识到,沟口雄三所意谓的这种"中国文明的冲击"将再度随着中国自身文明觉醒的冲动而重新萌芽,不过,未来所谓"华夏文明"到底是以何等形态出现,则是大家都无法揣度的了。



THOUGHT 思想



日本思想史的引介一直是国内出版界的软肋,最近有一本美国学者傅佛果的《中江丑吉在中国》(邓伟权、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属于少有的亮点。中江丑吉的名字不大为人所熟知,但其父中江兆民对于日本和中国思想界而言,都算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甚至还有"东洋卢梭"的美誉。关于中江丑吉,其人生最为戏剧性的一幕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他不仅帮助曹汝霖逃跑,而且还协助章宗祥脱身,当时报载,看到有一位"千钧一发之际,貌似冲入人群救出章的生命的日本人"。不过以今日角度来看,他到底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

在网上看到不少朋友推荐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王宇光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此书无疑

是维特根斯坦的经典传记。更有趣的是,此书进一步还原了维特根斯坦的真实面目,如他与维也纳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卡尔纳普、石里克都很清楚他们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差别,维特根斯坦关心"神秘主义"与"罪",而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对此毫无兴趣,且认为是无稽之谈。当时许多哲学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1929年,雅斯贝尔斯曾讨论过维特根斯坦,他说,尽管维特根斯坦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欢迎,但他根本不是实证主义者,而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最后再简要地推荐两本书, 刚刚出版 过《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译本的作者 沃尔夫·勒佩尼斯又有新译面世——《何 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 与精神政治》(李焰明 译,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1年6月),另外还有一本略显 专业但仍想重点推荐的书——《佛陀和原 始佛教思想》(郭良鋆 著,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1年3月第2版), 此书1997年 初版之后,很快就难在市面上寻得此书。而 之所以在此推荐此书,是因为郭先生是国 内少见以巴利文原典研究原始佛教思想的 学者,其师承自季羡林与金克木先生,在国 内佛教信仰逐渐"回潮"的今天,许多信奉 部派佛教的年轻人也开始对学习巴利文三 藏产生浓厚兴趣,毫无疑问,此书无论在学 术上,还是在宗教教理层面,都是值得认真 对待的著作。◘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上海, xiayouzhi1997@gmail.com)

我有位师兄研究命相之学,前来请教的师妹和师姐络绎于途。她们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师兄的解脱之道完全一样,他教授的人生观,可以总结如下:人的生命正如一根蜡烛,只是一隅之明,种种不测却像四面有风阵阵吹来,随时可能将蜡烛吹灭;但正如你所见,烛火对风是完全无能无力的,要想不被风吹灭,唯一的出路是时刻保持火力旺盛——让我们的情感、理智、能力和信心保持在最佳状态,一点不能有闪失。

经历了躁动不安的80年代,在整个90年代里,师兄作为人民教师,始终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他想尽办法,一点点把自己从偏远山区调动到丘陵地带,并在世纪末调进县城附近的郊区中学。世纪之初,他作为老光棍考上研究生,完成了华丽的转变,后来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任教。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想象这条路的坎坷程度。因为脆弱,所以要时刻保持强大,师兄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人生观,从悲观主义上升到超人主义,才能有心灵鸡汤——说鸡血更贴切一点——的效果。

但我觉得,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倒也不必要去反复推演易经——更不要说什么面相手相之术了。我们都学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熟悉那种稍一懈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的境遇。我们还在中国的农村生活过,观

察那里的经济状况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普遍的现实,除了彻底崩溃的时刻和随之而来的短暂的休养生息时期,农业经济始终保持着危如累卵的状态,如此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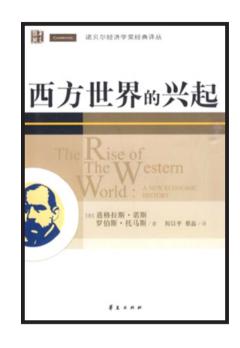
这种状况,黄宗智教授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著,中华书局,2000年06月):产量增加是不断投入劳动力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种增长不可能持久。师兄尽管不是农民,却受制于农村的生活,尤其是90年代初期,他的工资由乡政府发放的时候。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不管师兄或骆驼祥子多么强调自己是超人,也有绷不住的一天。这不是虎妞使然,而是经济规律使然。

经济学家看待工业化之前的农业,都 着眼于人口与产出的关系,术语称作"马尔 萨斯陷阱"。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主义 经济学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 觉得,西方的崛起意味着制度终于调适到 了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更少的土地可 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 著,厉以平、蔡磊 译,华 夏出版社,2009年6月)。17世纪的荷兰率 先做到了这一点,随后是英国,它们凭借的 是商业和工业革命,毫不奇怪,这两个国家 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土地较多的法国 和西班牙因为动力不足,摆脱马尔萨斯陷 阱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里,我感到非 常痛心。因为在法国和西班牙逃离马尔萨 斯陷阱之后又过了两个世纪,且承受了历史 上空前绝后的生育管制,中国才看到解决这 个问题的希望。照诺斯的说法,造成这种局 面,人口本身不是问题,制度才是关键。

我读到的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是费 孝通的《江村经济》(费孝通 著,商务印 书馆,2001年3月),也叫《中国农民的生 活》。这本书是1938年写的, 我读到的时候 恰逢此书写成60年,看完后心情很惆怅,觉 得中国农民的生活和60年前毫无区别—— 也许更辛苦一点。后来湖北有位乡党委书记 李昌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信 里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农村景象,并且总 结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如果和费孝通的著作做比较,这封信没什 么学术价值,但很有道德感染力。问题是我 不相信总理不知道这些。从诺斯的角度看, 中国农民的悲惨境地乃是制度使然;他们 遭到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剥夺,但既不能逃 进城市,也不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得到补 偿,因为这个制度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还 抑制创造性劳动。这个问题不是改善官员 的道德品质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民的生活》其实是费孝通的 博士论文,他写这本书时他还很年轻。在



结尾部分, 费孝通表达了自己热切的感情, 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以便造就一个统 一的市场,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和工 业部门,早日摆脱岌岌可危的贫困生活。这 种感情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常见的。 从好的方面说,他们在道德和情感上和农 民联系得很紧密。从坏的方面说,他们寄 希望于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会解决中国农 民的生存危机,最后必定发现自己是在缘 木求鱼。如果官僚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国 家就会变成农民的敌人,甚至是一切有志 于改善个人生活的中国人——比如我的师 兄——的敌人。

整个90年代,有一个噩梦始终追随着 师兄,那就是他随时可能重新沦为农民:一 次婚姻,一次教学事故,都可能中止他艰苦 的进城之路。这种恐惧终于催生了他那套 只属于少数幸运者的心灵鸡血命相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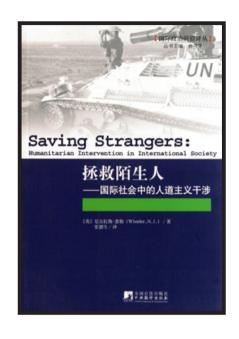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夏末秋初,执政42年曾经固若金汤的 卡扎菲,终于一泄千里。此时此刻,尴尬的 不仅有国朝外交部,还有前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者吉登斯。他曾与卡 扎菲促膝长谈,展望未来,认为"利比亚可 望成为北非的挪威"。(《周末画报》4月30 日)利比亚没有成为挪威,却很快遭遇挪 威,在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介入中,挪威派 出6架战机。

利比亚的未来不容乐观,在卡扎菲无孔 不入的治理下,利比亚不像埃及拥有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是摇摆于铁板一块和一盘散沙之间。但是,转型艰难绝不意味着应该拒绝转型,拒绝转型的代价远远大于转型的代价。在社会匮乏的情况下,利比亚的转型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可是这又会遇到人权和主权之争。

对于经过多年"主权大于人权"教育的中国读者而言,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介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人道主义干预,常被理解为"干涉他国内政"。3月份的"独立阅读"曾经推荐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任辉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那本书讨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和可能,重在理论分析,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惠勒的《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张德



生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4月)重在个案分析,书中借鉴了沃尔泽的观点。鉴于"干涉"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的指定含义,"人道主义干涉"似以翻译成"人道主义干预"为宜。

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 道主义干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是"冷战 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有三个个案:一是印 度对巴基斯坦的干涉,一是越南队对柬埔寨 的干涉,一是坦桑尼亚对乌干达的干涉,第 三部分是"冷战之后的人道主义干涉",有 四个个案,分别是伊拉克、索马里、卢旺达、 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

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科索沃事件,在1999年5月那场"中国可以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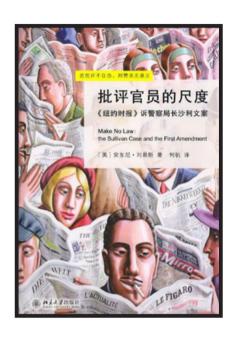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的指定散步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被视 为世界警察,米洛舍维奇被视为反美斗士。 惠勒批评了"西方领导人道德上的花言巧 语",并且指出"北约的这次干涉不算是一 次人道主义干涉的好榜样"。但是,惠勒并 非《环球时报》的同道,他高度评价北约的 行动:"自联合国建立以来,在没有安理会 直接授权的情况下,联合国第一次认为他 们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另一个国家使用 武力是正当的。而且, 北约的行动在极大 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同或默许。"惠 勒对北约的不满,在于他们只是空袭,没有 出动地面部队,未能更为有效的阻止米洛 舍维奇发动的种族屠杀。在惠勒看来,国 际社会不仅有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力,这还 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十余年后,重新来看科索沃事件,值得中国读者反思的是:为什么反对世界警察的常常是"警察国家"?美国不必然正确,"反美"就必然正确吗?进一步思考下去,人道主义干预和"干涉他国内政"、人权和主权究竟是什么关系?谈到文学和政治,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有一个精准的说法:"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同样,人权应该干预主权,直到主权停止侵犯人权为止。

逃亡中的萨达姆,随身携带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米洛舍维奇的亲密战友姆拉迪奇,在狱中要求看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如今,困兽犹斗的卡扎菲,不知是



否有暇读书看报。如果时光倒流,他更应该读点法律,而非文学。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安东尼·刘易斯 著,何帆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值得所有认为自己权力固若金汤的公仆们认真阅读,但是公仆们想必只批阅文件,无暇读书。"《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美国法治史上的大案、要案、重案。在中国,大案、要案、重案往往意味着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在美国,大案、要案、重案与奥巴马是否批示无关,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关。

1960年,一则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声援黑人发起的和平示威,其中批评了蒙哥马利市的警察。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控告《纽约时报》涉嫌诽谤。广告确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沙利文胜诉。《纽约时报》最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



HISTORY&CULTURE 文史

法院一致裁决,撤销原判。大法官布伦南在 判决意见中指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 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 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 锐的攻击。"他指出,应该允许公民批评政 府官员,哪怕言论有不实之处,除非政府官 员能够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确 有恶意,即被告知陈述虚假,故意为之;或 玩忽放任,罔顾真相"。"《纽约时报》诉沙 利文案"的判决,为公民和媒体对政府官员 的批评开拓了最大的空间。

《批评官员的尺度》的作者安东尼·刘 易斯两次获普利策奖,擅长"普法"写作, 此前他有两本书被译成中文,分别是《**言论** 的边界: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简史》(徐爽 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和《吉迪恩 的号角:一个穷困潦倒的囚徒是如何改变 美国法律的?》(陈虎 译,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0年7月)。

《批评官员的尺度》的译者何帆,同样擅长"普法"写作,同时擅长"普法"翻译。 这个夏天,先后收到他寄赠的两本译作,另 一本是琳达·格林豪斯的《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布莱克门对死刑的态度似乎有些"暧昧",他表示,如果自己是立法者,会投票反对死刑,但是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又反对司法机构介入死刑存废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刑罚的设置,包括死刑,都是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构决定之事"。可以看出,这种"暧昧"的态度背后,是对立法和司法界限的坚守。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中,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过于斩钉截铁,以至于双方难以对话,更加难以深入讨论并

这本书的扉页是"燃灯者"的图案和一行小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 这很容易联想起赵越胜的《燃灯者》(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会想起万圣 书园化用的郑愁予诗句:"是谁传下这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非不重要的程序性问题。

最后,散布一个好消息,《燃灯者》即将 在内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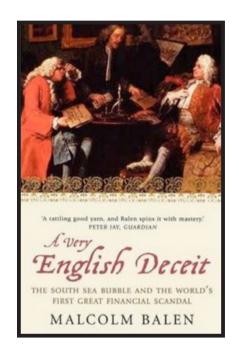
政府如何偿还公共债务?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sunjiaoji@gmail.com)

最近一两个月,中国的媒体在热议一个话题。根据官方的审计结果,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7%。和美国的87%、英国的80%以及日本的210%相比,中国政府的负债比率看上去并不算高。不过也有人指出,如果把地方隐性债务算上,数字就可能非常庞大。到底有多大?暂时没人能做出精确的估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债务累积过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在将近三百年前就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任何一本金融史都不会绕开的话题是世界上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南海泡沫、以及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对这三次泡沫成因的解释十分一致而笼统:人们丧失理性,盲目投资,把大笔金钱砸向他们心中永不贬值的投资物。然而,泡沫终究是要破的。当泡沫灰飞烟灭,投资者的激情随之冷却,他们会发现自己手中的股票或者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已经贬得一文不值。经济史研究者查尔斯·马凯甚至干脆把金融泡沫的原因称为: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

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了经济史中的老调长谈。不过,以英国1720年的南海泡



沫(South Sea Bubble)为例,我们会 发现其实政府债务才是股市泡沫和金融 泡沫的真正源头。"南海"(South Sea Company)原本是一家1711年成立的股份 公司,由辉格党议员,牛津伯爵罗伯特·哈 莱(Robert Harley)和一些贵族创立,主 要的经营业务是英国在南美洲殖民地的贸 易。南美洲有什么呢?南海公司向人们宣传 说,那里有金、有银、有烟草,把南美洲的生 意打理好了,就意味着金山银山滚滚而来。 而牛津伯爵创建这个公司的最大目的,就是 为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筹集资金。

就解决负债这一点,BBC的顾问马

尔科姆·巴伦(Malcolm Balen)在《典 型的英国式欺骗》(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一书中指出, 当时的英国政府"每 年需要花费5500万英镑, 去支持部署在欧 洲大陆的九万人的军队,以及四万人的海 军部队。在1710年的时候,军费开支已经占 到了政府财政总收入的9%……政府的财政 问题还在持续,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 政府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被它所需 偿还的利息给消化了,到了1714至1717年, 这个比例已经至少上升至50%。"英国政府 因为战争而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多一个筹钱 的渠道,于是同意成立了南海公司。因此, 南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主管也都是由政府 颁发和指派的。

在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下,英国自16世纪开始仿效荷兰等国成立了早期的"国有企业",例如莫斯科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等负责殖民地贸易专营的国企。但问题在于,在缺乏严格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政治与商业的合谋,其结果就是无所忌惮地追逐利益,无视公正、道德和一切社会准则。坏商人和坏政客的结合,结果就是"坏"的最大化。于是,英国的议会也就在这帮"坏人"的兴风作浪之下,被搞得乌烟瘴气、黑幕重重。

南海公司是一家股份公司,因此它是对外公开发行股票的,同时,它又是一家英国国有的公司,所以它既得到政府支持、又是为政府服务的。南海公司内部的"坏人"们一起开动脑经,根据公司的这种特殊情况想出一个赚钱妙招,即利用公司的"国有"背景,将股票与国债进行交换。南海公司决定向英国议会提出一个名为"南海计划"(South Sea Scheme)的大型换股计划,让人们用手里的国债交换南海公司的股票。这样,股民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持有量就会在短时间内暴增,到时公司只要略施手段抬高股价,那泡沫产生的收益就不仅可以偿还政府的公共债务,还能让公司轻松大赚一笔。

获得御准生效的最终认股方案中,南海公司用公司的股票作交换,以很低的利率购入市场总值高达3160万英镑的债券,并且"回报式"地支付政府数百万英镑现金。到1720年,南海公司承诺接收全部国债。当上下议院通过这项计划时,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暴涨:从1月的120英镑每股,到3月的200至300英镑每股,再到4月底的400英镑每股……当年8月南海公司向市场抛售12500股公司股份的时候,股价已涨到1000英镑每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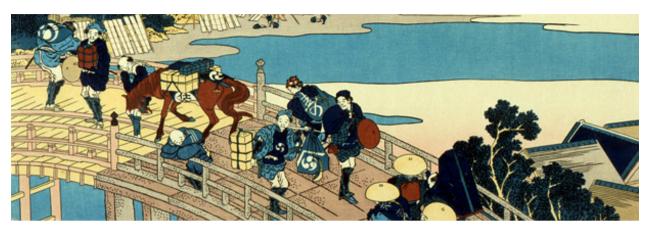
1720年8月,作为大庄家的南海公司 突然开始抛售股票,股价顿然失去了支撑, 一泻千里,从最高点的1000英镑,跌至150 英镑,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过程居然只花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小股民们猝不及防,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手中的南海公司股票已变成草纸,甚至连草纸都不如。当时的伦敦证券交易市场,不见了人们往日喜悦的神色,只见无数英国人投入股市、希望通过购买南海公司股票增值的血汗钱,突然人间蒸发,就像一听跑光了气的可乐,只剩下黑色的死水微澜。在书里, 马尔科姆·巴伦却对在南海泡沫中蚀本

的英国股民毫不同情:投资者们过于贪婪、轻信,而这一特点恰好被政府和股份公司利用。为虎作伥而终于身陷虎口之人以两字概括足矣:活该。

这就是政府将债务压力转化到股票市场的恶劣结果:当政府需要利用股市来偿还公债的时候,股民们离遭殃就不远了。 三百年后回看这个历史事件,中国人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为什么同样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叩关",中国和日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为什么日本能自主地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从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中华文明却未能内生出这种过渡与转型的动力?这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高华认为,由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之"顺利"走上资本主义,绝非明治维新一蹴而就的结果。

黄仁宇在《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一文中如此写道:"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主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

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 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 明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有竞争性的农 业生产者……及至十九世纪初期,幕府 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 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 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 取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 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设施持续 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 所以事半功倍。"黄仁宇着眼的"维新之 前的一百年",刚好是江户时代后期,相 当于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 一个世纪,大致与日本历史学者吉田伸 之的著作《成熟的江户》所勾勒的时代 相吻合。

《成熟的江户》是一部野心勃勃的 著作。作为历史学者,吉田除了传统史学 研究方法之外,还借鉴了年鉴学派和文化 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以对社会的"分层



构造"的把握,来复原十八世纪江户社会的"整体史",旨在"描绘出日本前近代漫长的历程中,日本史与世界史真正相遇之前所达到的程度",从而论证"包括衣食住的独特性、人们之间相互的结合关系、家的意识、宗教、民俗、艺术等多种多样的侧面,即日本'固有文化'的形与质均在十八世纪这一时期成熟并结晶成型"的结论。

日本描绘近世历史的叙事文本卷帙 浩繁, 历来不乏以町人和农民为主轴的 通史,但吉田的学术视野显然大大逸出了 传统的叙事框架,直抵历史的细部,秉承 法国年鉴学派所谓"活着的历史学"的基 本理念, 力求重构恢复人的"整体性"的 "整体史"。为此,作者以"江户时代的江 户"为舞台、聚焦的人物多为被排斥干手 中掌握"社会性权力"的富豪和"士农工 商"之外的"身份性边缘"阶层,如百姓、 工匠、按日计酬的短工"日用"、乞食化缘 的艺能者和"愿人"等等, 统统是被历史 教科书所忽视, 也不会在"时代剧"中登 场的小人物。可恰恰是这一群边缘化的小 人物,乍看似乎处于主流社会的律法秩序 之外,但实际上亦有自己的组织和游戏规 则, 其价值取向及谋生、行为方式, 不仅 催生了活色生香的町人文化,同时也构成 并强化了江户社会"成熟"的质感。

日本现代转型之"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无非是中产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产生。尤其是后者,其产生和扩大端赖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松绑、放权者甚大。"享保改革"之前,除木匠、石匠、



《成熟的江户》 (日)吉田伸之 著,熊远报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05月

泥水匠、修屋顶的、铺榻榻米的等少数御 用职业外,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行业共 同组织均未得到政治权力的公认。但随着 "享保改革"的深入,至1721年(享保六 年),对染坊、点心铺、陶瓷屋、木屐店、 玩具店等96个业种,以一定地域为单位. 设立商业一工匠同业组合,从而产生了超 越町一村的狭义地缘范围、以职业功能 为纽带的社会性结合。这种自上而下的权 力公认, 无疑也意味着幕府的社会控制 和统治形态的转变,在十八世纪的幕府政 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世民间社会 的工商业组织,虽然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 上的行会, 却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基础。乃 至江户时代后期,围绕甘薯交易问题,在 生产者、中间人和买家之间发生过一场纠 纷,其起因、发展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与今

天屡见不鲜的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现代商战简直如出一辙。

1999年,柏林东方美术馆发现了一幅浮世绘稀世长卷《熙代胜览》,经鉴定为彼时的市井绘师于1805年(文化二年)前后绘制的作品,描绘了江户著名的商业街日本桥的繁荣景象。在这条仅有760米长的街道上,共有小卖店和批发

店88间,各商号门前均挂着印有商标或店幌的暖帘、看板或旗子;熙来攘往的行人中,成年男性1439人、女性200人、儿童32人;犬20只、牛4头、猴子1只、鹰2只……这幅"江户版"《清明上河图》色泽明艳,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比"汴京版"晚了约700年,但所表现的已然不是同一种文明。**○**



虚无之境的性荒诞



特约撰稿人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总觉得华人是这个星球最有野心的 一种人, 而华人作家则是华人里的翘楚。 每个写字的心中都或隐隐或明目张胆地 放着一个伟岸的梦想,不管这梦想是否属 于你,更不管这梦想离自己多少光年,反 正你不能抹杀我做大梦美梦的权利,更 不能让一个人放弃做梦的自由。听起来非 常崇高,甚至庄严而伟大,但真的有必要 吗? 真的有必要非得每个人都要来一篮子 梦想才叫活得像个人样儿吗? 这是虚空的 道理,是邪念,但,却不能被抹杀。从写了 几个字就声称惦记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作 家,到要出人头地永别贫穷自我打扮成畅 销书的作家,华语作家一次次地将底线 掀开给你看,让你看到卑微梦想主义的 存在,同时也让人一次次无言以对。

读冯唐的《不二》之前,难免先陷入 到巨大的宣传攻势中,称不上被打败,但 各界名流纷纷发言,或赞美或称奇,你已 经不得不将之放入期待之中的行列。作 家本人参与其中更是如鱼得水,不知道是 不是每个写出一本牛逼书的人都要这么 搅和进来。曾经写小说写得风姿卓越的朱 文,在改行去拍电影后曾说过,跟观众交 流要我来解释影片的含义,这是件非常 失败的事(大意如此)。当然,交流是人 的权利,这一点不值得指责和不解,但交 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关于这个时代的败 坏和卑微还是值得聊聊。作家善用舆论, 或者在"同盟"中找到归属感,这是人的 交流和生存本能,但在作品面前其实这些 都不重要,我认定的大概一本书那么厚 的东西已然摆在那里,那便是最好的交 流, 所有煽情的体恤和变态的赞美都在 小说完成最后一笔时跟我无关,也就是 说,小说要承载它自己的命运,作家本人 无必要为之安排人生。

关于《不二》声势浩大的舆论,当然 可以理解为个人喜好,旁人管也管不着。 我只能说几十年下来,不说我们的作家在 文本上有多少进步,就是在自己作品的外在形式上也还一样透着股没出息的劲儿,这跟当年浩然写完《金光大道》后倒在沙发读《人民日报》上的那些激情万丈的评论不是一个意思吗?一种恶心打败了先前的另一种恶心不也还是恶心吗?

既然这本书是以"性爱描写"而鼓噪四方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有必要来看看在这方面《不二》的表现。已经不能说《不二》包含了性描写,而是要称这是一部企图用"性"来贯穿天地人生的小说。用性来立论,更用性来证明性于宇宙万物的生长关系。

《不二》对男女之事的描写,如果非要跟当代华语小说做个比较,可以是贾平凹的《废都》。相比之下,《不二》多了分凌空蹈虚的邪劲儿,而《废都》更多人间烟火的土气。换句话说,冯唐所描写的更多基于文学想象力,或者说此类美好生活一种的描写让人提不起劲儿,"无力感"不是不够声色美好,而是如美空网站的模特宣传写真照一样,超多PS、大量特效处理,加上极致光线之后,早已不如邻家女孩真实自然地触动你心房了。

意淫式的而不是接地气的写女人、写性,反映在作者笔下的美女都有共同的特征,比如光滑的肌肤、长而浓密顺滑的头发……这些无法让人动容的模具式写法,效果就是无法亲近,这里的女人不过是水中月。铺陈那么多性描写,妙用了那么多性器官,淫而不乱,乱而不颓,颓中见空灵,这种处处见器官又让人读不出多少性之丰富、性之美好来的写法,大概只能



《不二》 冯唐 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7月

医学博士才能做得出来。像手术刀般精准 地划开、切割,使之裂断成一个个具体的 器官细节,但其活灵灵的一面、功能的一 面、人之美好的一面都飘到空中去了。

大和尚、老和尚、小和尚,还有唐朝皇上李治、大文豪韩愈等,与名妓也是个尼姑的"玄机"扯不明白,他们一方面不断发生肉体关系,另一方面在心念和精神上有着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交往。"玄机"美艳动人,更珍贵的是她懂得调动男人的一切器官和感官去达到性的满足,但这些表层的性描写之背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和逻辑让人去揣摩主人公之间的性爱密码。他们悬在空中的,也是绝缘于你我生活的想像产物,诞生于想像,也死于想像。不管是性爱还是仇杀,还是基于表达人性的日常生活、非寻常事件,大概都需要一条可寻的规律来控制其各种

走向,但《不二》除了要表达一个不受任 何约束、一次性敞开了使劲聊的关于美好 性爱的主题,你看不到这些发生的必要。 我以为不管是掺入了禅宗的思想和古中 医的玄学,还是将原本与大地关系最为 密切的性爱写成半空中吊儿郎当的玩意 儿,这些都并非作者故作玄虚的结果,而 是作者压根就无力去安排明白这一切发 生、发展的动机。"玄机"与"云茂"的一 段长达三页纸的放肆告白,是性爱描写 的一段高潮,"玄机"一边借助"云茂"高 超的发明,一边将自己的肉体与发明物融 为一体,各种体态的美好在"玄机"聪明 而善解人意的话语中达到了非现实的高 潮。但压抑者更压抑,世间淫荡瞬间止于 言, 快感了然于胸, 却又瞬间化为蒸汽, 空留一道白色雾状颗粒,而让人无法触 摸得到。或许你将之理解成这是作者故 意处理成的一个反高潮,是一种积攒,必 将在日后爆发。但遗憾的是,这种止于语 言美好的境界贯穿全书始末,凌空蹈虚 式的性爱描写更像是科幻作品, 你知道 人类根本无法享用。

凭着自己鼠目寸光的阅读,我总觉得以往作家,尤其是以文字典雅具有美感功力的作家,写及性爱之时,总以不着一"脏"字却尽显声色云雨之美为荣,冯唐显然正好是这种作家的相反,甚至虚妄地猜测——他是看不起那种一字不漏尽显风流的穷酸文人做派。冯唐要做的就是流畅地使用各种器官名词和性爱动词,来构建那种性爱的奇思帝国。他不忌讳,甚至喜爱不同性器官的不同说法,根据剧

情安置在不同位置,第一眼让人陌生而吃惊,看到后来你会觉得没什么的,就跟新闻中常用的局长、书记、贪污等词一样稀松平常。这是冯唐对汉语的一次澄清,他至少证明了汉字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匮乏的真相。

不仅如此,正如冯唐的粉丝津津乐 道的那些语录式的语言,比如"自摸是 很卑鄙的幸福",同样是具有杀伤力的武 器。作者除了赋予"玄机"身材火辣迷人 以外, 更是令其掌握了一种动人的语言, 她说:"同时睡还是分别睡?"这语言之 犀利, 犹如网上著名ID"木子美"的口 语,干净利索,直捣问题要害并可以让部 分道貌岸然的先生们先吃上一惊。"玄 机"某种程度上与木子美的语言品质有相 似之处,或者说她们的语言品质有接近 的地方。这种"接近"只是一种基于感觉 而非客观的认识,不能较真地举例证明, 因为反证的数量亦可能可观。如果你恰 好对这两人的语言都浏览过,对我所说的 "接近"要么会心一笑,要么骂为蠢货, 这样即可完全不用论证了。作为胆大心不 细的评论者,无论何时都要做好被骂蠢 货的心理准备,这样不是谦逊,而是我打 心底里觉得这种关于"蠢货"的指证很多 时候是对的。通过文学作品揣测作者、端 详其意境,即便偶尔与作者当初试图奔 赴的方向一致,也难免常常要暴露出手忙 脚乱的滑稽举止。

当然,论及冯唐在《不二》中之所以 呈现出迷人的一面,不仅仅跟他善用和爱 用那些让人尤其是有阅读习惯的人少见 多怪的生僻字有关,我以为更重要的是, 在冯唐的叙事结构和语言里,有一种强 大刻意的反差美。简单说就是当他古朴 抒情地写了几大段后,突然几组口语化的 "脏"词跳跃而致,这让人难免惊愕刹那 的同时,而享受到一种爆发力极强的反差 之美。非怪诞,非晦涩,而是一种轻佻的 俏皮或者灵机一动。当然,我们不能说前 面那悠长散发出古朴芳香的章节,正是为 最后那重重一击所作的铺垫——对于作 者可能可以这样说,但对于读者来说,这 种双重感缺一不可,正是他们互相作用力 双重影响之下才产生的阅读快感。

揣测冯唐受欢迎,大概还有一个原 因,可能就是作者人太聪明吧。这些聪明 也反映在他不拘一格地使用交错的叙事 风格上,与上面提及的"口语"终结"书 面语"相类似的是, 冯唐在文中常常令两 组不搭界的词汇交错出现在文中, 意外、 惊喜之中又能让人觉察出一种和谐之 美。这是对汉字的精通以及作家本人的 聪明所达到的语言之极。冯唐的聪明,更 使他可以在平常的叙事中夹杂自己的价 值观,他不忘调侃时事,比如讲高句丽如 何断定中国历史在挖坑掘土之后考证成 那是他们的历史, 更比如这段: "最难办 的地方是,即使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 大人物最后的决定是糊涂的, 所有的人 都没办法改变,大人物有他们一生积累 下的逼人跟随的气场, 所有人的利益不 是一个。极少数的例外往往涉及一个脑 子极其好使内心极其强悍的女人,或者 一个太监,或者一个天生得道的孩子。"

捎带着卖点自己的私货,这这种写法不但不会让人"出戏",反而会迎来意外的喜感和更多的尊重。

《不二》在缺少该有的阅读快感同 时(本来就破戒了,可该有的声色又让人 提不起什么劲儿),在读完之后又让人有 一种不可估量的患得患失。有意思,没意 义。当然, 意义又是什么呢, 听起来像假 大空、形而上的伪命题,但就是可以铺垫 的玄虚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切之后仍是一 场玄虚之境,不大不小,刚好与作者潇洒 洋溢出来的差不多大小。这是无意义的 意思,好比一个卖弄了半天的相声,大家 都在等待最后大包袱的时候,艺术家弯 腰鞠躬告诉你,本场结束了,刚才那些稀 稀拉拉的笑声就是你要等的包袱,别无 其他了。这样说不知道饶不饶口,反正我 看到这一切时,真的感到一种许久不见的 无聊,像老长时间不见关系并非亲密的中 学同学一样让你亲切,但又倍感陌生。

与其说冯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游走并推动了整个叙事,不如说是曾风靡华语文学圈的魔幻现实主义再现了力量。 "……有些村落靠巫婆乳房的疼痛感知遥远的村落想要传递的消息,有时候这种消息的传播比事情发生的还要迅速。" 这种叙事的"根"不管长在哪里,它所吸收的都是当年拉美爆炸文学的养料。

冯唐称自己的书不提供具体行动的 指引,"《肉蒲团》服务于手淫,《不二》 服务于意淫。我不和李渔争夺反革命手 淫犯了,我也争不过。"既然没有行为上 的意义,那么落脚于意境的营造,寺庙、 山林、长安城、古宅、古筝、琵琶、诗文、 淫诗浪字、奇淫巧计、交欢椅……这些表 面上的手段冯唐都用上了,所谓意境款 款走来,但这些道具并没有演变出一幕 让人意犹未尽的精彩大戏,所以意淫的 "意"在于揣摩和端详之后的心灵满足, 这种文学作品的张力,作者并没有让我们 感受得到。

宣传中声称的"读时过瘾,读后茫然"类似的性活动生理快感,显然也没有实现。"挑战禁忌"四个字是做到了,不但挑战性描写禁忌,更挑战了宗教、伦理等宏大命题,但这正如一场壮观的革命一样,命是被你革了,但你并非就此再建立什么,这就是一种虚无的快感。对作者来说可能是信笔游疆,并企图将这种对禁忌的冒犯建立在更宏大的背景

下,比如对人性的原始释放,对宗教的溯 本清源式的解读,但这里所谓宏大背景 的建立充其量只是斑驳的装饰墙,看似 花里胡哨魅影四射,实则只是虚设的一 道暧昧不清的、内心空荡的石膏假墙。 不敢揣测作者是否有建立宏大叙事并重 新书写国人宗教与性爱的双重历史的野 心,但倘若有此念头,那还真够令人失 望的。毫无疑问, 冯唐的才华最出色的 地方在于抖机灵和一语中的式的调侃、 幽默上,而非高深地构建一种境界。从 被人引为谈资的性描写上,也能看得出 来,这种意淫式的描写让人分不清是科 幻还是魔幻,反正是缺少一种击中人心 柔软部分的或重或轻的那么一下。这也 正是促使《不二》成为通俗文学的一道 推进剂。○



新井一二三的游记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pessoa1935@gmail.com)

读新井一二三,大概起于《万象》杂志,她写的八十年代留学中国大陆时的旅行记给人很深的印象。这是我读她的两本集子《我这一代东京人》和《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的最大动因,再有就是这两本精装小书设计得非常合理,可以摊开读,没有一般小精装书根紧、必须双手狠命掰开才能看的毛病,如果后一本书里的图片不是只有邮票那么大小,简直可以入选"最美的书"了。

早在大陆留学时期新井一二三就 给日本写通讯,后来又给香港媒体写, 2005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发表文章。用中 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前面还听说一位茂 吕美耶,这两位都有在中国留学(生活) 的经历,对中文的把握确实在行。新井在 序言里谈到自己写文章的故事,简体横 排,繁体竖排,有次手写日本作家幸田露 伴名字,编辑认成了"幸田露体"——这 位资深撰稿人想说明的是,"在计算机上 用繁体字写的文章,只按一个键就能够全部换成简体字,我真的感动极了",然而繁简转换如果真这么简单,恐怕错漏会更多。另外还要捉一个字虱的是,简介最后一句话"她和先生都是专职创作者,一人写鬼怪小说,一人写散文","她和先生"似该为"先生和她",不过未必算得到新井的头上。

新井推崇旅行,尤其是独自旅行, "在我看来,能够一个人旅行是独立人格 的标志",这是段位还处于阅读旅行手册 的读者如我很难领会的一种理念。但是, 她在中国大陆的游踪却不经意地流露出 了历史的细节:

"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北京,连长安街上都没有汽车的影子,反而有许多待业青年没事干地蹲在路边,晚上趁黑在大街上踢起足球来。但是的北京人还没有穿牛仔裤的。"等她到了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第一百货大楼,商品丰富且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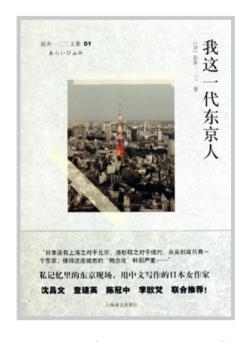
髦,连牛仔裤都有卖。"而她在中山大学留学时,有位教授夫人多次请求她帮忙从香港带一台洗衣机,因为新井是留学生,有当时外国人才有的"白卡"。

又比如她认识的北京摇滚分子丁武 王力臧天朔崔健们,"北京许多人还穿军 装的时代,他们就已经打扮得好前卫,在 别人看来蛮奇怪,疯疯癫癫的。"还有上 海待业青年阿鹏,偷渡到香港去的广州人 阿成和阿德,他们的命运都能在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找到注释。

这些堪称"他者"的视角,可能不一 定准确,可是留下了真实的第一观感,像 底片一样,不会遭到飞黄腾达之后的自 我修复、自我虚构、自我神话。因为她是 个局外人。可以说,通过新井八十年代在 中国留学、旅行的经历,三言两语透露出 来的当地风俗风物面貌, 当时流行趋势, 这些丰富的细节也能增进中文读者对这 段历史的了解。现在谈到中国的事情,往 往会以先进国家为借鉴案例,新井在《我 这一代东京人》里提到1964年奥运会改 变了日本,这是近代化的标志,设计高速 公路的工程师们填了东京的交通网络水 路, 当然种下了环保恶果: 新井父亲记忆 里可以游泳和抓鳗鱼的神田川, 在她记 忆里却是"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 把旧货干脆推下河去"的地方——日本 政府的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 来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末,市议会才通 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这些先 进国家的"失败案例",也是在这种私人 角落里被记录了下来。◘



《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



《我这一代东京人》 新井一二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0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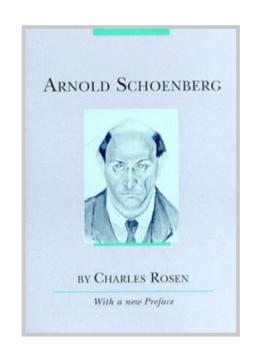
奇异的私人演出协会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美国音乐学家罗森的Arnold Schoenberg(Charles Ros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一书中有篇重要文章, 说到一战 时期, 音乐生活近于停滞, 勋伯格自己的 写作也正难产,但他做了一件独特而重要 的事情,就是于 1918年成立了一个"私 人演出协会"(Society for the Private Performance of Music),旨在认真排 演当代作品,目标听众是对这类作品有 兴趣的人,每周开一场音乐会。这个协会 中,很多重要成员是勋伯格的学生,比如 伯格(AlbanBerg),曲目包括斯特拉文 斯基、拉威尔、伯格、巴托克、韦伯恩等 等,演奏者也是青年学生。这个协会是勋 伯格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尽全力排 演那些非常困难的现代作品,对格外难 理解的东西,会重复多次演出,有时排练 还会向观众公开,以利于大家"听清"这 些作品——听过上述一些作品的朋友, 大概会理解,"听清"是件多么不容易的 事情。

听上去,并没什么出奇之处。有意思 的地方是,音乐会的作品和听众并不限于 勋伯格的学生或朋友圈子,但观众必须 是这个协会的成员,所以基本都是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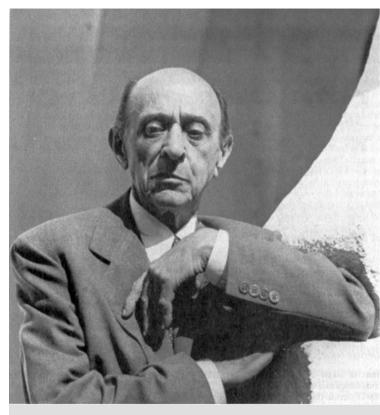
家,并且,要参加系列音乐会,必须同意 一个条件:不许写音乐会报道,不许公开 发表评论,大门口竟然还有牌子,"批评 家勿人"。音乐会结束之后,连掌声都不 允许。

这听上去有点奇怪,既然是好事情, 为什么不多宣传,为这类资金短缺、公众 关注短缺的艺术活动,多吸引一些支持 呢?如今我们做类似的事情,都唯恐没有 足够的宣传和媒体支持吧?

我一向爱读勋伯格自己写的文章——他还真是个相当好的批评家,更 是理论家。他在各种场合中表达过这样 的意思:真正的作曲家不为别人写作。他要求避免媒体渲染,也就是避免时尚期待 ——说白了,就是避免干扰,避免艺术目的之外的力量来左右艺术(好像回避通货膨胀),哪怕一点点的舆论,哪怕是鼓励,甚至那么一点小小的暗示。

顺便说一句, 勋伯格和他的作品, 因 为难以被传统接受,多年来处在极度的孤 立和同行的敌意中,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外 界的干涉、公众的谈论是怎么回事。罗森 在本书的序言中说,1945年,勋伯格70 岁时,在音乐界声誉已经相当高,但申请 著名的古根海姆艺术基金还被拒绝。多 数大师在这个年纪,生活已经不成问题, 勋伯格也得到了承认,但,音乐界对他的 敌意还很明显。他每月从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UCLA)拿38美元津贴,还有 太太和三个小孩子要养。为了谋生,他只 好把时间都用在教学上。后来,他写文章 "感谢对手","是他们成就了我"。但你 想想,一个时时要自我捍卫的长角长刺的 人,在生活和艺术理念的方方面面,可能 很柔顺圆通么?还有一个事实,他是犹太 人,后来改宗天主教,但这是真心的,而 不是像马勒那样出于生计被迫改宗。事 实上, 希特勒掌权之后, 勋伯格反而改回 犹太教。

言归正传。在这个协会开始的一年 半时间里,勋伯格都坚持不演出自己的 作品,以防这个意愿纯净的组织成为私 器(当然,后来也演奏了)。这个协会也 避免演奏主流作品——显然主流作品也 不需要他们来演,除了极少的例外。在这



图为 勋伯格

里,音乐成为音乐家的私有之物,清晰地和社会生活分开:不讨论,不推广,不"教育"公众。

协会坚持了三年,后来由于奥地利通 货膨胀引起的财政困难而结束,总共演出 一百多场——这个密度放在今天,也相当 可以了——而这发生在一战刚结束之际, 而且他们演出的都是新作!

大家都知道勋伯格一辈子有着强硬的戾气和清晰的追求,因为最糟糕的回报和最毁灭性的轻视,他都经历过了,艰辛难以尽述。而关于勋伯格的"为音乐而音乐",如今许多人都会立刻举手反对一一让音乐和社会分开,和非音乐家分开,成为音乐家自我完善的东西,这和时

代风习太格格不入了,再说,评论家和公 众的意见,一定全无用处么?它们不会引 入新灵感,不会给作曲家带来启发吗?还 有,艺术家总归需要资金,一旦进入操作 层面,怎么能完全不向公众妥协?但我认 为,当艺术处在一定的封闭状态的时候, 它成长、变化、成型得更快一一当然,这 也是一个注定引起争议的命题。大众口 味往往是多重复、无方向、易于半途而废 的,虽然因为参与者众多,可以引入芜杂 的灵感,但干扰的成本还是太高了。

协会在1921年举办"告别音乐会", 宣布它的解散,但1922 到1924年—— 奥地利作曲家杰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延续了它,成员稍稍扩 大一些,并吸收了一些业余爱好者来听, 而不仅仅是音乐家。

看来, 勋伯格执拗到野蛮, 有着"精

神贵族"的决绝。但近于洁癖的态度和他 自己那种高度个人化、规则过多的作曲体 系一样, 注定难以保持(在作曲上, 他就不 断打破自己立的规矩)。但这个音乐协会 作为一种独特的试验,是很值得纪念的。 我总是相信社会中人应各有分工,有一群 小众躲起来往尖锐的方向走, 尽管脱离人 群,但是你放心,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多,世 上99.9%的人口,根本不会选这条路,而有 勇气选择这条路的人,旁人应多多鼓励支 持;其余的人各有自己的轨道,所以你也 不用担心,自会有多数人去奔健康、实用、 可推广、受欢迎的路。前者在世上影响甚 小,但往往有独特的创造性,有可能在历 中上留下可积累的财富:后者则可能享受 现世安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大家在世上的各种格子里各就各位,很好。**Q**







昆明访书记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pessoa1935@gmail.com)

"昆明的确是好地方,如果将来发了 财,颇想在这里盖一所房子,一年里来住 他几个月。"

1944年,黄裳先生在《昆明杂记》中如是说。而我们在翠湖边吃过午饭,沿先生坡而上,穿过文林街,走到云南大学附近一处小区,偶然看到房屋中介的玻璃门上,均价都超过了一万一平。看来60年之后,在昆明盖房子的愿景是越来越遥远了。我正后悔没有带上黄先生的"少作"来游昆明,转角却出现了一家书店,店子甚是文艺,名曰麦田,门口贴着新近"名正言顺"进入中国的马尔克斯大幅招贴。不用问,这里一定有新版的《百年孤独》,不过我想的是书店的租金岂不更贵?

如果不是诗人雷平阳带路,我即使在文林街附近走了好几个来回,未必能发

现这家书店。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文艺书 店多少都看垮过几家,而文艺书店又多少 都看起来大同小异,惊喜欠奉。麦田自有 其文艺特色,比如音乐,有黑胶也有CD 唱片,又比如二手外文书,当然也比如你 在各地书店都可以见到的时兴文艺作品, 这里都有。但进书太快了,不说那些大路 货,像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的《**异域盛放**》 (简・基尔帕特里克 著, 俞蘅 译, 南方 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等一套四册软 精装小册子,来昆明前刚刚给朋友讨了一 部,竟然这里也有。著名的陈侗鲁毅策划 的著名的法国午夜文丛新书, 摞着七八 本,书后盖着蓝色印戳"样本",老板说 是寄来征订的样书。在广州的书店里过往 的午夜文从都难得一见。最为有趣的是 我们刚刚做了评介的《妓女与文人》(斋



藤茂 著,申荷丽 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2月)一书,这里也有货,而我前不久才 买到这套丛书中的另一本《刻在石头上的 世界》(林巳奈夫 著,唐利国 译,商务印 书馆,2010年9月)。

如果今天还爱逛书店, 你就不得不 忍受千篇一律的大型超市书店,或者书目 大多一样的小书店。在麦田书店,我多少 被冲击了一下:像前面提到的书,明显不 是剩下的,而是进货选择的结果。诚然, 今时今日,你要买书大体上都可以在网 上解决, 但在书店里见到久欲一读的书, 立刻攫住的那种心情,我想爱书人都有 体会。对我来说,日本人芦原义信的《街 道的美学》(尹培桐 译,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6年6月) 就是这样一本书,立刻 捏了一本在手里(只有两本)。而摆在显 眼位置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旧版书系"从 书,则提醒游客,这里是云南。这套书收 了不少学人作家关于云南的旧作,如艾 芜的《南行记》,李广田的《西行记》,丁 文江的《漫游散记》等,勒口书目有李霖 灿的《雪山·碧湖·喇嘛寺》,可惜店里没 有,只好取了新出的《昆明的雨》(汪曾祺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汪曾 祺先生的书, 搜罗了不少单行本, 江苏文 艺出版社的《汪曾祺文集》十年前混迹在 另外一座城市就已买得,山东画报出版 社近年出的汪氏各种"闲情逸致"小书, 更是案头读物。我一直盼望《汪曾祺全 集》出版,可以读读他晚年的短篇小说, 可惜两年了只听楼梯响。还是买了这本汪 老关于云南文章的汇集,坐在麦田书店的 门口,喝着诗人泡的茶,消磨一个下午,把这四十篇短文章都重读了一遍。

汪老说昆明的雨季"好像相当长的。 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 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 且并不使人气闷。"而我们在昆明那几天 正当雨季,大啖菌子。他又说"昆明的雨 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那天 下午也下了一场大雨, 算应和了这本书, 只是书有不少错别字,版权页更将作者 写成了"冯至",不知道算不算"错版"? 但对我来说,在麦田书店买这本《昆明的 雨》,足以算得上一段游踪的纪念。看目 录已经觉得这是一本上好的旅游指南, 尤其是对没有到过昆明的人而言(想来很 少了) ——跑警报、西南联大固然已成陈 迹,但翠湖、凤翥街就在左近,还有昆明 的雨, 刚吃的昆明茶, 论斤卖的鲜花和菜 市场上的牛肝菌,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有 访书的踪迹。

前不久看某书友用谢国桢先生旧题写《江浙访书记》,今天看来颇有些"坎普"味。世上自然有人经常访书记,但我的积习总是访书。翌日我又跑到文林街吃了一碗汽锅鸡肉米线(见店中碗有缺口,立即目为老字号,铁了心要吃),跳上出租车,"去卖旧书的地方",司机说那叫小屯旧货市场。往北久久未到,又尘土飞扬,问了司机两次道路是否正确。司机答,我们整天在城里跑,清楚得很。颇不以我的质疑为然,且以了如指掌的口吻说,此处的旧书只有周末两天才开。无聊中我又夸昆明的空气好,司机也很不以为然,与昨

天另一个大赞城市发展的司机完全不同 观点。看来访书记、访书,都该好好问问 当地司机才是。

到了旧货市场,果然有个超大的旧 书地摊集市,不少摊主打出"2元一本"招 牌。蹲了一圈,只拣了两三本可买可不买 的书:《太平广记》第五册, 吕凤子的《中 国画法研究》,长征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新 闻通讯选评》下册(通讯特写)——这是我 十一年前的入门书,相见颇有苏童论塞林 格之感: 他虽是一张用旧的钱币, 我总不 欲见其被人糟践(大意)。双腿酸麻之际, 翻出一本"文革"中武汉印的毛主席手迹 选,有意思问问价,想不到那位据书箕坐 的老板挥挥手: 起码上千, 我要卖给戴金 表的。真是太不客气了, 只好很羞愧的放 下书走开了。旧货市场里面还有几家实体 旧书店,竟然在第一家找到一部毛边本的 《徐霞客游记校注》(徐弘祖 著,朱惠荣 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那 个年月印的书而又毛边,说不定是校注者 自留的——恰好扉页已撕去, 姑且作此遐 想。好在这家店老板没有看我的手表,并 且价格公道,不枉我风尘仆仆一场。

小屯的旧书,有关云南地方风物类不少,只是太大路货。买此类书最佳是在大观路——当时我和书友正在翠湖边压马路,他突然想起李公明老师有一篇在昆明大观路访书的文章,我遂立刻电话李老师问了店名,驱车跑去——昆明的士司机大概太熟书店了,下车便是民族书店。这里有两家都卖旧一点的书,太旧的就自定价。民族学学者汪宁生的三巨册著作,不

敢下手, 选了《云南掌故》(罗养儒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3月)和李孝 友先生的《**昆明风物志》**(云南民族出版 社,1999年1月),都是好玩的地方文史 书籍。接着又找到李孝友先生一本《嫏嬛 著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精装本,45元。这几年小精装从书不少出 版社都在推出,此书列入的"云南文史书 系"则从未见过,不知还有其他什么人的 著作,不过李氏所此书收录的《木氏土司 的诗文别集》、《"释儒"担当》、《精校 细勘释钱津》等篇都引人兴味。在另一家 书店也找到一本与云南有关的风土志《滇 海虞衡志校注》(范成大 著,广西民族 出版社,1984年12月)。在昆明找到与 云南有关的书自不足奇, 奇怪的是还淘到 王健群先生的《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 民出版社,1984年),好太王碑在吉林集 安, 却在云南昆明淘得此书, 不能不说是 书缘了。

听说大观路附近就有一个超大的图书批发市场,但来这两家的人却委实不多,老板也叫我们多选选。看到文史资料出版社的"文史资料选辑",堆了一书柜,也就不客气地翻起来。这套"内部发行"的丛刊保留了不少清末民国人物的回忆录,虽有政治气候原因,但大体上可见其经历,残篇断简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我依着感兴趣的人和事选了一些,如冯玉祥北京政变,美国收藏家福开森,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李宗仁代理总统前后,此外有一些较有意思的话题,如民族资本,国民党时期的邮政,北京的钱铺与银

号等等。最有意思的是第六十五辑中《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沙文求是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的弟弟(沙孟海字文若),参加过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次年被捕牺牲。从沙文求的信中看得出这位早期共产党员对家族的影响,他的三弟、四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而尚且是非党员的沙孟海也受其影响——以前曾和师友谈起过沙孟海在解放前经历复杂,而解放后却能以

艺术大师的身份平安度过各种政治运动,

曾猜测他负有秘密任务,是冀朝鼎一般的 人物。今天读其弟弟沙文求的信,或可见 一二端倪。

买书最忌选残书,结账时,我还是拿下了精装本的《**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此书共有十三册,要配齐只有向网络书店求救了。不过,第一册正好是辛亥革命前后十数年间的事,现在读岂不应景。再说,读残书的好处即是读一点是一点,真有了皇皇十三册,恐怕真没有时间去读了。**○**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

——专访刘再复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 lingzi0815@gmail.com)

晚宴上,刘再复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 朋友们提到的故友往事,他总能马上忆起相关的故事。

"有一年我在美国,几个学者朋友找到我,说要反对中国加入WTO,说这是加入殖民国家阵营。'你要站出来讲话啊,现在大家都在砸玻璃,很激动人心啊!'我说我只关注,不参与政治,后来与李泽厚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们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在他今年出版的随笔集《师友纪事》中,刘再复细致回顾了与钱锺书、胡乔木、周扬、胡绳、聂绀弩等人的交往过程。这种广泛的交往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文化领域的"活跃":1985年他起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此后提出"文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念,强调文学应从"人"出发,把性格看为"不仅是行为方式也包括心理方式、感情方式的总和",突破了建国时期的意识窠臼。《性格组合论》还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在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后, 刘再复与李泽厚等人被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报告中点名, 被迫离开中国。同年冬天, 几位社科院领导通过去访美的原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董乐山带话, 转达刘再复"中央已指示社科院, 希望你回国, 但我们的意见是你暂不要回国。"刘再复自此开始了"漂泊者"的第二人生, 在美国定居至今。



图为 刘再复近照



INTERVIEW

九十年代,他与同在美国的李泽厚对谈,出版《告别革命》一书,提出当下中国更需要改良而非革命,又一次引起 轩然大波。

新世纪以来,他则转而投身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回归古典",以对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席后接受专访,梳理其几十年来从"反叛"到"回归"的思想变迁。

"来不及展开"的八十年代

你曾说"八十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 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你认为这种价值 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里,你供职 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文学评论》起了什么 样的作用?

这种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包括消极方式与积极方式。

消极方式带有历史针对性,即从具体的历史场境出发,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对生命价值的践踏。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动不动就把人界定为"黑帮"、"牛鬼蛇神"、"黑五类"、

"黑九类",个体生命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我在八十年代写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只不过是在证明"1=1",即"人等于人"。所以必须对文革的疯狂行为及错误理念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批判,才能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积极方式,是指八十年代正面地介绍和建构了一些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理念。除了重新大讲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主题就是反对人的异化,还从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评介存在论,从而使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加缪等人风行一时。存在论的主题正是探讨个体生命如何成为自己的可能性。在文革与历次政治运动中,人变成非人,我变成"非我",所以必须回归自我,重新发现自己。

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所通过《文学评论》和其他学术方式努力表述的正是八十年代的时代主题,我们从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和论两个基本途径张扬时代主题。《文学评论》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连载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不是因为我是"所长",而是《文学评论》需要举起肯定个体生命价值这一旗帜。

INTERVIEW

那时你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等同于胡风"主观论"。八十年代似乎也不像今天大家回忆中那么自由?

八十年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宽松",尤 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提出一些 突破性的理念还是很有压力。例如《红旗》 杂志就发表了陈涌、姚雪垠的文章对我展 开批判,把我界定为"反马克思主义"。

1986年,我在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全国性研讨会,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新时期文学批判有余、忏悔不足"的新论点,正式表明"忏悔意识"的理念。即是说,我们过去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共犯结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没想到,这引起一位领导人生气,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因发言稿发表在《人民日报》),对我的理念进行严厉批评,结果《人民日报》不得不立即发表两篇和我商讨的文章。学术商讨永远是必要的,但领导人的愤怒却给我造成政治上的压力。

你曾说"八十年代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展开",这怎么理解?跟这种政治压力有关吗?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确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但是,新理念要 具有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 学术经典来支撑。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洛 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家的理念都形成 学术专著,但八十年代仅有的几年时间不足 以让思想者坐下来从容地著书立说,建构思 想经典。我写《性格组合论》仅有两年多时 间,而且这两三年中俗事繁杂,很难有沉浸 状态,我相信多数学人都有时间不够用的苦 闷。"五四"时期胡适自省说,他们那一代人 是提倡有余,建设不足(大意),恐怕也是感 到"太仓促"。我曾认为,"五四"启蒙者缺少 建构现代思想经典的意识,现在应补充说, 即使有此意识,也未必有可供建构的时间。

即便如此,你认为自己在八十年代提出"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已经"尽了一个思想者的责任"。但这也导致你后半生的漂泊生活。如果当时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八十年代还会如此活跃和"反叛"吗?

如果没有在八十年代提出一些被视为 "异端"的理念,可能就不会有漂泊的第二 人生,这一因果是个事实。但是,对于人生, 我只追求丰富,并不求功名与平稳。因此,漂 泊之后虽然丢失了"荣华富贵",却感到生 命格外充实。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喜欢乔 伊斯所说的,"漂流是我的美学"。在此心态 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你的问题:即使当时 能意料到后半生的轨迹,八十年代我还是会 如此坦然。我还想补充一句话:思想者把思 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漂泊让我赢得思想自 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八十年代能预料到可 以赢得这一幸运,那我的思想将更加活泼。

interview

"告别革命"的是与非

九十年代你与李泽厚先生在海外谈"告别革命",引起哗然,所谓"两边都不讨好",至今依然。你认为它始终不能被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你提了一个很好的、可以作为学术探索的问题,但我恐怕难以做出让你满意的回答。

"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四九革命等)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

从反对者的角度说,他们认定现在这个执政党已"无可救药",改良、妥协的办法已无济于事,唯有通过暴力革命"重新洗牌",中国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也反对"告别革命"。

对立的双方,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



《告别革命》 香港版第六版

双方在思想脉络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继续。1894年甲午海战以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终,失败的大耻辱带来心理的大倾斜,也带来急速改变中国的"大激烈",并形成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激进思潮。这种思潮认定"火与剑"的方式是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方式,所以孙中山在与康梁的论辩中自然就占了上风,孙中山的方式(暴力革命方式)也成了唯一神圣的方式。我们不否认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孙中山的方式是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告别革命》给中国近代史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认为改良派与立宪派的"维新"方式未必是"历史死胡同"(胡绳语)。

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的原因还涉及

INTERVIEW

到中国的大、小文化传统以及"除恶务尽" 的国民性问题等等,说了话长,留待以后再 讲吧。

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当时二位对谈时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告别革命"的观点在今天是否仍适用?

《告别革命》对话与整理的时间是 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时间 是1995年。到今天,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 特别是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可以说,孙中山 的梦(在《建国方略》中所表述的铁路、海 港梦)实现了,中国已相当富强并将更加富 强。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付 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还带来社会的变质 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亿万 富翁,另一部分人未富起来而仍处于贫困状 态。这种状态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危险也 是暴力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中国现在正是革命最容易发生的时期,阶级差别、阶级冲突进一步激化。中国人向来只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产生怨愤和不满,在这种历史场合下,"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在

《告别革命》中说: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将永远存在,在矛盾冲突面前,只有"阶级调和"(改良、妥协)与"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两种基本选择,我们认为,前一种选择比较好,代价比较小,但"调和"不是投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斗争。其实"改良""调和"更复杂、更麻烦。

我和李泽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 "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问题,不能回 答你的是否"适用"于当下实际的问题。

今日中国社会现状被《告别革命》言中, "一方面是孙中山梦的实现,一方面是孔子 梦的破碎。"你对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持何态 度和预期?

我不是预言家,对中国未来的二十年 发展不敢预言,但还是有所期待。今年四月 初,我回国参加母校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 庆,在"国学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创 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的讲话,就期待中国 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即创造出 中国的现代化自式。这种"自式"既不是转 向他式——照搬西方已有的范式,也不是 转向旧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 套式。现在有人讲"中国模式",觉得中国 应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是对的,但他们似乎 拒绝接受普世价值,拒绝政治改革,这又不 对。创造自式是很难的,必须不断试验、不 断探索、不断改革。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可 能创造自式,而且历史提供的机会只有今后

INTERVIEW

这二三十年,错过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于未来的二十年时间要特别珍惜。

你与李泽厚先生多次提出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要返回"人的原点"。但李先生又抱悲观态度,认为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不可避免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难免成为半机器半动物的存在,知识分子只能发发空喊。对此,你持何心态?

所谓教育学的世纪,是指重新塑造人、 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我们期望,教 育学能成为21世纪和22世纪的中心学科, 但只是愿望而已,因为个人无能为力。人类 的异化现象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操 作体系,学校也在被操作之中,但我们看不 清操作者是谁,是科技?是欲望?是竞争压 力?我看不清,所以也有点悲观。

重回古典不是重回"大一统"

如今你倡导回归古典,从"文化反叛"的 先锋转变至此,观点看似分处两极。这之间 有何关联?具体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

你用"文化反叛"这一概念来描述我并没有错。在八十年代,我对传统思维惯性确实反叛过。但是如果你使用"文化批判"这一概念,可能更为贴切。

今天我倡导"返回古典",并非复古, 而是对古典进行现代性的提升。也就是说, 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时代 需要去对中国古典资源进行重新开掘与 阐释,既有文化发现,也有文化批判。我写 《红楼四书》,是对《红楼梦》进行现代性 阐释,写《双典批判》也是对《水浒传》与 《三国演义》进行现代性阐释。前者是我对 评红意识形态化的反叛,后者是我对"造反 有理"、"欲望有罪"两大命题的反叛以及 对权术、心术的拒绝与批判。

八十年代与今天的观点,其实都是在 张扬个体生命价值观,批判反人性与反尊 严,只不过在八十年代我的"反叛"与"批 判"更为直接,"返回古典"则曲折一些。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李泽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针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走势而发的。我们认为,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破坏、颠覆),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的活水。

八十年代至今,你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也有变化。比如现在更加强调,人道主义必须落实为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充分尊重,否则就

INTERVIEW

成了空话; 西方对人的发现,除了大写的一面,也有荒诞、脆弱、无可遁逃的悲剧性的一面,等等。这些变化是由什么触动而起?

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强调人 道主义,有一个讲述的语境问题,因为文化 大革命太不人道。出国之后,我身上的"诗 人气质"即浪漫气质减少了,人生的巨大沧 桑使我走向清醒、走向理性,因此许多观念 也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否定自己以前的 理念,而是思索的深化。

以人道主义而言,我出国后首先分清 属于学术话语的人道主义和属于政治话语 的人道主义, 觉得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走 出中世纪的黑暗,让人从神权的统治中站 立起来,这才是人道主义的本来面目。但18 世纪这个概念逐步被政治化,变得很复杂。 苏联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英美讲自由人 道主义,在校园里,"西马"讲人道主义,存 在主义者也讲人道主义,各讲各的,让我感 到太空乏,最后我感到,人道主义一旦变成 政治概念,便成为一句空话。有感干此,我 才觉得,泛泛讲述人道主义、标榜自由人权 并没有意义。在当今历史场境下,个体生命 已被巨大的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器所掌握, 人显得特别脆弱,特别没有力量,比卡夫卡 时代尤甚。在此语境中,如果未能把人道 主义落实到对个人的真实处境的正视,这个 "主义"就会变成政治幌子。

八十年代我讲"主体性"理念,也以为自己很有力量,以为可以改变世界、改变

国民性,出国后才清醒地认识到,这完全是妄念。自己不仅没有力量改变世界,连自身的生存能力都没有,甚至连自我辩护的力量也没有。阅历深了,才明白世界上根本没有理想国,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全都严重极了。西方经济危机的背后其实是严重的思想危机、人性危机。当代人的荒诞性比卡夫卡所发现的荒诞性严重一千倍一万倍,所以我对人的认识也从莎士比亚、歌德走向叔本华、卡夫卡。既承认人是很了不起的"宇宙精华",也正视人是很有问题的、被魔鬼(欲望)所掌握的双脚生物。

萧功秦先生在李泽厚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社会现在有逐步丧失社会共识的危险。你认为"返回古典"是否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如果可能,应从哪几方面努力?

七月初,我路过香港返回美国时,读到萧功秦先生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 在谈话中他对左的激进和右的激进都加以 批评,相当理性,我的印象很好。但他提出 "中国逐步丧失社会共识的危险",我则想 作点商讨。

首先,社会共识是指什么?政治共识还是伦理共识?或者是宗教共识和文化共识?"共识"很容易让我想起青年时代天天都听到的"统一认识",那种定于一尊的共识好不好?现代社会乃是多元社会,即使统

S访谈

INTERVIEW

治思想是一元的,阐释时仍可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多元的,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过去我们只认同第三国际,现在则吸收第二国际的许多思路。《告别革命》也是第二国际的思路。中国的大智慧是"和而不同",共同创造一个和平、安宁、富强、幸福的国家,这是"和",但是在通向这一目标时有不同见识也很正常,不见得就是危险。有不同的声音,社会才是健康的。

不过,"社会共识"的问题如果不是笼统地讨论,而是具体领域具体分析,也是有意义的。一个国家有一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就是共识,萧先生如果是担心丧失此共识,倒是有道理的。在伦理道德领域,有些道德底线不可越过,这也应当形成共识。道德具有绝对性,不能说杀人放火也可以,诈骗偷窃也无妨。现在有些人越过道德底线,做什么坏事都自以为天经地义,这就很危险,在这个领域中,萧先生敲一敲警钟,很有必要。还有一些领域,例如宗教领域,我就觉得不必有共识,即不必有统一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统一宗

教"和"政教合一"带来极大问题,其中的巨大教训值得吸取。

刘绪源先生提出,提倡返回古典是否会导致重返儒家提倡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为执政党找到传统观念中的合法性。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古典"是个庞大的系统。我曾说过,中国古典,有两大基本脉络,一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的思想系统;一脉是以老、庄、禅为核心的重自然、重个体、重自由的思想系统。除了这两脉之外,还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系统。李泽厚先生主张"儒道互补"与"儒法互用"。他更多地讲述返回儒家之脉,我更多地讲述返回庄禅之脉,所以才形成对话。李先生虽然讲回归孔子,但重点不是讲回归儒的大一统,而是讲儒的重现世、重人生、重情感这些根本,即与西方那种重天堂、重灵魂、重理念不同的根本。"返回古典"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可把它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大一统"。

走向生命, 不是走向概念

在国外你获得充足的读书时间和内心的平静,但也不免与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隔离,思考与倡导内容可能不是当下最迫切或最热门之话题。对此你有何看法?从文化价值的裁判者转为观察者,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

你说的很准确。出国前与出国后,我的 文化角色确实不同,用你界定的"裁判者" 与"观察者"来加以区分也未尝不可。出国 后我自觉地选择了"观察者"的角色,只省 观、冷观,不介人、不参与,但关怀还是有

INTERVIEW

的,对政治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只要能见证 人性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可以了,不能要求 作家充当社会裁判者和世界改造者。二十 多年前我也有充当裁判者的妄念,以为自己 乃是"大众代言人"和"正义的化身",很可 笑。现在我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充分自由 表述的条件,可以处于"面壁"思考状态, 非常难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不敢浪费时 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 的,每一个体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只能 发出一点内心自由而真实的声音,只能把握 自己,不可能把握世界也不可能把握国内 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不再追逐时髦话题、热 门话题,也不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语,这也 许正是我出国后的一点"长进"。

与此同时,你也认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作家"过于知识分子化",可这是否是近现代中国作家们不可逃避的命运?你认为作家、思想家更适宜处于何种位置?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业余人",即走出专业的大门去业余的改革社会的人。一百多年来,中国作家做了太多"业余"的政治事和革命事,肩负太多文学创作之外的重担,从而丢失太多潜心写作的时间。这也不能怪作家,因为中国的近代史乃是被欺负、被羞辱的历史,中国人民历经太多深重的苦难,在此语境下,作家承受太多良心的压力,觉得躲

在象牙之塔中太自私,只有走向街头去拥抱社会拥抱是非才能心安理得。其实,作家所做的乃是心灵的事业,他们完全有不参与的自由,有隐逸与逍遥的自由。我们如果要求曹雪芹去批判文字狱,去谴责清王朝的专制政治,就不会有《红楼梦》。作家应站在历史见证者与呈现者的位置上,而不是站在改变社会的前线位置上。

所以你现在认为"生命大于学问",而非 "学问大于生命"?这一观点与李泽厚先生的 "吃饭哲学"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剥夺得太多,必须把时间追回,因此疯狂地读书、写作。为了做学问,我真是"不要命"了,真的把学问看得大于生命。八十年代初,与朋友讨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我仍然采取质疑态度,觉得人生总得先确定伟大目的也就是本质,然后才让生命为此目的而牺牲。

出国之后,我逐步觉得"本质先于存在"不真实,还是萨特的公式比较真实。也就是说,人首先应当活着,然后才寻找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二十年来我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连结,但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概念,或者说,是走向觉悟,不是走向逻辑,觉得生命的觉悟比学问的姿态重要得多。就以"自由"而言,西方关于自由的论著实在太多,这一论题的学问实在很大,仅哈耶克和比赛亚·柏林的自由论



INTERVIEW

述就够我研究半辈子。但后来我才明白,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停留于哲学的思辨,自由应是一种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身内,能否得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也不是天赋的。在生命困境中争取自由,这是生命;在概念

系统中思辨自由,这是学问,两者权衡一下, 我觉得生命更为重要。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是讲人首先应当重肉体、重生存 温饱,然后再立灵魂、求发展,与宋儒那种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路正好相反。

我认同李先生的吃饭哲学。♀

"决非偶然之事"

——哲学与公共生活

作者 Martha Nussbaum **作者** 吴万伟(武汉, wuwanweione@yahoo.com.cn)

曾经有个时期,人们讲授柏拉图的《理 想国》,但很少有人把它记在心上。苏格拉 底和充满热情的朋友(在节日和夜晚的火 炬接力赛间隙挤出一点时间研究哲学)讨 论正义的本质问题,他注意到他们对哲学 探索的更细腻部分采取非常随便的和玩世 不恭的态度,似乎认为这是竞争性游戏,所 以严厉地指责他们。他说,请别忘了"我们 讨论的决非偶然之事,而是一个人该如何 生活的大事。"四百多年后在罗马,塞涅卡 (Seneca) 再次批评那些把哲学当作一种 逻辑游戏来追求的人。他说"你没有时间 玩耍,你已经成为不幸者的顾问,已经承诺 要给海难受害者、囚犯和病人、穷人和头脑 被有毒的斧头砍伤的人提供帮助。你的注 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你在干什么呢?" (Ep.48,8)哲学有现实的任务,造福人类 的任务。所以希腊罗马哲学传统的典型特

征就是全体一致地坚守这个阵地。如果不

能在科研和教学上履行自己的任务, 哲学将

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空谈"和琐碎的花招而



图为 作者玛萨·纳斯鲍姆

遭抛弃。正如伊壁鸠鲁(Epicurus)指出的,"根本无法减弱一点人类的苦难的哲学论证就是空谈。正如药品若不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就没有了用途一样,哲学若不能治疗灵魂的痛苦,它的用途何在呢?"

当今学术界的保守言论常常把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描述为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反对任何"政治动机"的传

译介

TRANSLATION

统,一种敦促将从前的经典著作内置化,根 本不考虑教育的实际后果的传统。当然,这 种文化适应项目本身也有政治性,至少在如 下两个方面: 它将说服接人们受某些价值 观同时忽略其他价值观,与此同时,在塑造 公民过程中贬低批判性思考的作用。这种 做法在民主社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政 治后果。但笔者在本文中关心的是保守派 建议的另一方面: 虽然求助于古希腊传统的 权威和尊严,该建议的指导精神却与古希 腊传统格格不如。实际上该传统坚持认为 哲学应该具有实际的目标,如果没有了这个 目标,哲学探索和教学就成为可有可无的 自我陶醉的游戏,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古希腊传统还认为 批判性的审查传统是哲学追求自己目标的 方法中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另一个方式上, 这等于反对保守派所强调的轻易认同"千古 不变的真理"。

这种充满激情的实践哲学观一一坚信 人性善和通过推理和论证追求善的哲学观 是最初吸引我研究哲学的原因,无论是当 作家还是当教师。这里,我想谈一谈这种哲 学观的历史,但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作 为美国的大学教师,我们当今该如何从事 哲学研究。认识到改造生活的古代哲学概 念对当今多数大学生显得多么陌生,这一点 非常重要。在教育不是改造自我而是掌握 某些课程内容的大学体系中,学生们在接 触哲学时是把它当作众多课程中的另外一 门课而已,他们很可能把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伊壁鸠鲁、塞涅卡的著作当作需要囫囵 吞枣了解的更多知识而不是用来挑战其生 活方式的。我在古典伦理学思想课程的期 末考试中,常常让学生想象他们喜欢的希 腊和罗马哲学家如果来到布朗大学(作者 在写本文时在此教书——译注)可能会做 什么。他如何对待学生,他的讲授内容是什 么。典型的平凡答案是梦想柏拉图或伊壁 鸠鲁可能开设的课程。学生们很难想到还 有其他形式的教育。相反,更深刻的答案则 要求人们想象师生的整个互动方式,如何 质疑课程设置和讲授,如何把课程和私人 和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等等。实 际上,接下来我试图回答自己出的考试题, 并提出一些想法说明我在实际的教学中是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我已经说过教师和哲学家的工作是让 人生变得更美好。但我们需要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理解的改造现实方式的特征,尤其 是理解为什么认为困难的和强有力的哲学论证活动对改善生活非常重要。该传统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对哲学的定义是"运用推理和严格的论证去促进人类繁荣幸福的活动。"但更准确地说,哲学论证怎样促进人类繁荣幸福呢?幸福生活的哪些方面是需要哲学论证的帮助呢?我这里说的可能有些粗略和简单(事实上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一本探讨古代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

译介 TRANSLATION

的关系的书的概要),但我希望,它足以提供我在讨论教学时的参照系。我认为哲学教育的现实目标有两个:理性的自我考察和世界公民。

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某种公民:首 先,此人不是风俗习惯或者流行言论的盲从 者, 而是一个能够对最重要的事进行独立 思考的人,在接受某个观点之前会批判性 地仔细审查,逐渐认识到这些观点是否连 贯、如何连贯以及怎样为自己辩护等。苏格 拉底有一句名言"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 生活不值得过",他认为完全受规范和权威 指导的人类生活是不完整的生活,完整的 人生应该是充满了积极的批判性自省的生 活。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仔细审查的观念 是社会教导的观念,这种自省也是一种社 会批评。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批评对民主社 会的健康运行是不可缺少的。他把雅典政 权比作一匹驽马,而他自己就是一只不断叮 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虻。

希腊罗马斯多葛派哲学把苏格拉底的 画面再推进一步,描述了理性地批判规范 从而改善社会生活的一些方法。比如,他们 认为对人生尽头的严肃而深刻的考察将说 服我们相信金钱和社会地位远没有通常想 象的那么重要: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只 是在改善具有真正价值的某些人类活动方 面有一定用途。他们看到,如果学生接受这 些论证的结论不仅会改变学生的思想,还 将改造其欲望和感情。一个并不在乎社会 地位的人是不会对所谓的怠慢或冒犯感到 恼火的,一个不追求金钱的人更不会利用别人的劳动去发财。而且,如果一个人逐渐认识到人类尊严的真正来源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理性,他就会尊重所有理性者,不管其阶级、性别、国籍如何,一律平等对待。如果人人都能够尊重他人,平等待人,整个社会生活将彻底发生改变。

斯多葛派之前的亚里士多德在此画面 之上添加了另一个更重要内容。他认识到哲 学伦理学老师不仅仅是培养到社会群体中 生活的个人, 而且是培养社会生活的领导者 和设计者,这些人走出校门后可能去制订 法律甚至制订宪法。他认为,这些人明白人 生的最重要目标是什么非常重要和迫切, 因 为如果他们不清楚这些目标,就很难成为 称职的领导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领袖应 该为所有公民提供需要的东西以便人们能 够体面地生活。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和 斯多葛派的不同在于,他相信某种程度的物 质生活是与人生目标同样重要的活动所需 要的基本条件——虽然物质生活本身不是 目的。人们在饥饿的情况下很难冷静思考。 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利 益,他就不可能公正地行动。如果一无所有 就无法慷慨大方。如果被奴役被限制自由, 他就无法维持友谊。亚里士多德对物质和 制度资源有助于我们按真正人道的方式行 动的深刻分析在政治思想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尤其是在马克思早期有关工人被 剥夺充分的人性的异化思想中。亚里士多 德的结论是政权设计者需要认识到所有这

译介 TRAN

TRANSLATION

一切以便确保政权设计让"任何人"都有机会有效地追求幸福生活。不过,人们认识到这些是通过哲学教育实现的,因为哲学教育教导人们理性地批判传统,深刻地反省自己珍视的所有价值观。

亚里士多德倾向于关注学生作为社会 群体的成员资格和义务。但他推荐的批评 性思考要求人们进行彻底的跨文化研究以 便看到他人提出的好观点,或者看到本来 好的观点如何变坏。亚里士多德曾要求学 生收集他知道的世上158种政治组织的信息,因此制作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多元 文化课程(虽然希罗多德实际上被认为是该 领域的先驱)。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公民素 质的目标是作为城邦成员资格的目标,他对 人们如何对待生活在城外的人没有提出什 么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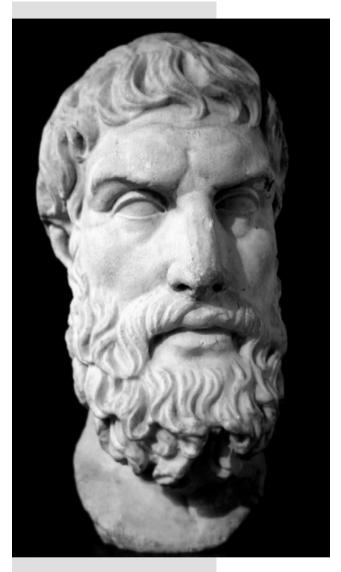
但是,斯多葛派认为该目标对哲学教育来说过于狭隘。因为明显的原因,罗马斯多葛派特别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这个事实,这个世界的优秀公民应该具有超越个人狭隘边界的能力。他们坚持应该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两个社会的成员:一个是我们出生的社会,它带着我们深刻的归属感和道德上没有经过反省的偏见和随意性的地方偏好,一个是整个人类社会。教育的任务必须是让学生认识到这个更大的社会,它常常被根深蒂固的地方身份认同和异常清晰的差异隐藏起来,从而认识不到自己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员。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能够认识人性,即首

先有能力思考人生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在哪里发现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希腊人罗马人。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能够对话,用智慧和敏感的方式与人类同胞对话,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正如塞涅卡常常指出的,要求人们了解他人的历史、职业和可能偏见。所以他们必须了解台伯河(Tiber意大利中部河流——译注)之外的世界。

 \equiv

我为这种哲学任务的概念所深深感 动。其实,如果我不相信确实有这样的任务 的话,我很可能无法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 享受给我带来快乐的哲学写作和教学的生 活方式。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实现了自我表 现和自我定义的自由,这在学界之外的地方 很难找到。如果没有这个任务,我很可能难 以容忍这种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的生活。但 在大学讲授哲学的事实并不能自动地推出 结论,此人就是在追求古代思想家描绘的 现实的政治目标。实际上,现代学术界的碎 片化和它与社会的分离使得人们很难看到 究竟该如何追求这种目标。这些特征本来 非常宝贵的,因为学术专业化有利于追求 卓越和创新,而学术界和社会分离能保护 学界免受压迫。哲学任务的问题因为人们 不能像古代思想家那样自由地重新设计教 学结构和模式而变得更加复杂。苏格拉底 可能讨厌我们大班上课模式的一切,但这





图为 伊壁鸠鲁雕像

并不能让人们自由地使用他的做法。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的众多学生,因为这不利于他们拥有广泛的生活经验,他们本来应该从生活中或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培养理性思考的能力的。(亚里士多德拒绝为年轻人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学)所以在撰写关于古代思想家的话题时,我必须思考他们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我的教学活动中实

现。在此过程中,这些思想家尤其是斯多葛派对教育的观察对我非常有帮助。

我认为,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伦理学教 学必须向学生传递伦理学问题的复杂性和 紧迫性的认识, 让理论与他们自己的生活问 题直接结合起来,而且以栩栩如生的方式 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实际上, 这是以希腊罗 马哲学家作为伦理学的好开端的原因之一。 因为像柏拉图、塞涅卡和伊壁鸠鲁等作家 都思考过戏剧场面和紧急情况在哲学写作 上的作用,后人在这方面再也没有超越过他 们。人们在阅读如《会饮》(Symposium) 或者《理想国》时,不可能认为哲学不过是 乏味的逻辑推理游戏。但老师在这里必须 也扮演一个角色: 我在讲课时把大部分精力 花在如何给学生讲清楚议题,尤其是把深 刻的人类问题戏剧化,然后显示这个或那个 解决办法的优劣。我想让学生看到哲学立场 是解决问题的尝试,立场的矛盾冲突不仅仅 是思想问题而且是在某些恼人的两难困境 中做出道路选择从而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 问题。我还想让他们明白在很多情况下,哲 学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过于简单根本无法 对付问题的复杂性。我不希望学生成为盲目 的哲学爱好者, 而是希望他们不断返回到自 己的生活中询问什么合适什么充分, 简而言 之, 学会自我反省。

撰写过伊壁鸠鲁的哲学话语的亚利安 (Arrian)指出,在写作中他只能抓住伊 壁鸠鲁教学法的一部分:因为他不仅用他 的话而且用他的声音和手势进行交流。实

译介

TRANSLATION

际上,我发现自己在当演员的那些年所掌握的表现技能在哲学交流中决非可有可无的,尤其是在现代大学的背景下,人们没有苏格拉底式的与单个学生面对面交流的选择。所有传统学校推荐的与每个学生个别交流的方法在课堂上都不能直接实现。但我认为,可以通过展现充分的人类丰富性和戏剧化场面激发每个学生寻找自己的矛盾冲突来接近这个理想(实际上,塞涅卡和伊壁鸠鲁本人都使用了这种方式)。有时候可以采用塞涅卡的方式,即使用历史和当今例子阐释所讨论的问题。我的论文作业常常要求学生思考与实际例子相联系的问题,要么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要么从当代公共生活中选取事例。

但是,我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将问题 戏剧化和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在 显示理性论证在促使个人或社会在达成解 决问题办法时所发挥的力量。哲学不仅仅 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古老学问,而且是通过 推理和论证获得幸福的生活。要做到这一 点并不容易。塞涅卡和伊壁鸠鲁描述了普 通哲学学生是有特权的半吊子,他们往往 太喜欢逻辑推理游戏,在探索撒谎者困境 时没有想到自己的谎言,在阅读克吕西普 (Chrysippus) 有关逻辑难题的文章时, 并不思考自己世界的难题。哲学家需要克服 的毛病不是拒绝思考过分复杂的问题而是 拒绝思考真正的问题。而要认识到这种排 斥,就需要依靠戏剧场面和个人的现身说 法。哲学家也知道另外一种学生,这些学生

认为传统规范很好,哲学没有什么作用。但 他们遇见的这种人很少,因此,为了想象与 这样的人对话而引起的愤怒情绪,塞涅卡 必须想象自己和几乎无法表达自己思想的 亲弟弟对话。在美国的本科生教学中,我们 常常发现这种学生,他们往往是因为必修 课的要求来上哲学课的。当然,我们也见过 一些热衷复杂逻辑的超级学生。但如今这 种特别聪明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 蔑视理 性和论证。我作为布朗大学本科生老师面 对的最持久问题之一不是让聪明的学生思 考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且是让他们尊重哲 学所能提供的逻辑审查技能。因为太常见 的情况是他们接受了没有仔细考察的观点, 竟至于认为理性是全能的,真理和客观性 是帝国主义的两个教条。当然,如果他们愿 意从哲学角度考察这些观点,可以与他们一 起深入探讨和审查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和 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学生在推理 不清、充斥术语的论文没有得到好成绩时 可能非常恼火,如果他们竟然承认哲学审 查与其观点相关,人们或许仍然希望通过 显示他们竭力推动的社会目标(如反帝国 主义、反性别歧视,反种族主义)并没有得 到否认一个观点比另一个观点更好,一个立 场比另一个立场更强大的主张的支持来说 服他们。我在教学和写作中就是不断这么 做的。简而言之,哲学的现实目标的紧迫性 能够赢得人们对其程序和方法的尊重。

当今学术界的哲学教学必须使用书籍。如果使用得当,书籍实际上能够在推动

译介 TRA

TRANSLATION

学生的自我反省方面发挥宝贵作用。柏拉图 的《斐德若篇》(Phaedrus)中的人物苏格 拉底表达了对书面文本的怀疑,理由是它们 对所有学生讲的内容都一样,根本没有考虑 不同的背景和需要。而且书籍推动他所说的 "智慧的虚假理解", 让学生误认为仅仅靠掌 握文本中的内容就变得聪明起来,而不是引 导学生进行批判性论证。塞涅卡在他关于自 由教育的著名信件中重复了很多这种观点。 但柏拉图和塞涅卡仍然写书,显然他们认为 书籍虽然有危险,在教育上还是能发挥积极 的作用。人们制订一个哲学经典的书单,把 它们贴上"伟大著作"的标签时,哲学著作 的危险最大。因为这种可怕的程序显示这 些书才是权威,贬低自己思考的地位,促成 人们对经典顶礼膜拜的态度,这和真正的哲 学思考是格格不如的。但是,正如塞涅卡坚 持的,书的使用有多种方式,它也可以为活 生生的论证过程提供营养。亚里士多德补充 说,如果我们不阅读前人的最好作品就可能 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读过这些作 品,至少能避免他们帮助我们避免的错误, 我们甚至能够在批评性地思考这些著作后 取得超越它们的进步。

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在讲课时试图 把希腊哲学传统的作品当作思想高尚、关 系密切的"好朋友",可以深入和细致地讨 论问题的伙伴,这些著作能训练我们独立 思考。我们的目标总是思考。伊壁鸠鲁讲了 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此人来到他面前吹嘘 已经掌握了克吕西普有关选择的著作。伊 壁鸠鲁回答说:"如果你是运动员,过来告诉我说在你的房间里有一套新的举重杠铃,我不会说'太好了。你做得对。'相反,我会说'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你的举重本领啊'。"书籍就像训练思想的杠铃,除非人们能显示依靠它的帮助成为思想深刻、感情细腻的人,否则它就没有任何用途。

我们现在谈论第二个目标:培养世界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也能够推动这个目标,因为这些著作主要探讨的是人们在很多地方和时间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学习希腊哲学家时我们接触的是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得不考虑我们与他们的异同。我认为,学术界对世界公民的追求显然需要其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不会颠覆"西方传统的学习",反而使得它更加准确。

当今人类最紧迫问题的辩论越来越有 国际性,为了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学生需 要意识到参与辩论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复杂 性,不仅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而且要了解多 样化国家内部的其他族群。学生们需要具 有文化敏感性,能够与其他传统的成员对 话。这种敏感性要求学生掌握人类的共性 和特性。当然,现在试图让本科生教育花费 "同等时间"学习世界所有文化是愚蠢的。每 个学生都了解一些其他文化,对任何一种文 化都没有深刻认识。但精心设计的多元文化 项目至少向学生显示西方文化的某些看法 可能很狭隘,指导学生如何考察新的和不 同的文化,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保守派批

译介 TRANSLATION

评家常常指控的,这样的目标隐含着文化 相对主义或者认为一切观点都有道理,偏 偏没有理性地批判传统的空间。在贬低理 性的氛围见识批评方式的学生很容易犯错 误。这是我仍然坚持认为理性和推理的哲 学在当今有关多元文化的辩论中仍然能够 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在这场辩论中,希腊 哲学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因为他们一再地 显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的生活方式及 其社会根源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搁置理性 批评,对背景的关心与追求普遍的人类之 善的目标完全一致。

我们作为古典学家也不应该认为大学 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会破坏我们的事业。常 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在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目 标的情况下继续讲授古希腊经典呢?似乎 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其实, 正如 我上文指出的,学习古希腊实际上能向我们 显示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合理目标的有力论 证,多元文化主义也促进我们作为古典学 家的科研和教学,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经 典中的特殊性和地方性内涵,通过认识到 经典在不同背景下的定义而加深我们对经 典的理解。(它能向我们显示人类跨越文化 和历史鸿沟的丰富的共性)。支持多元文化 主义能够让我们失去某些客户,那些因为核 心课程要求被迫上我们课的学生和那些因 为要成为权威而想读希腊经典的人。但我 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损失,我们必须寻找那 些为了正确推理而学习经典的学生: 他们学 习经典是因为这些著作本身,是因为我们 对这些著作的讲授充满活力和令人神往, 因为经典显示了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明史,因为经典探讨了多数人都要面临的 种种大问题,提出了值得我们尊重、认真研 究和独立批评的论证。

兀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讨论课堂和课 程等教学问题。但大学老师也是学者和作 家,他的部分活动与其教学角色密切相关。 因为一方面老师向学生讲明哲学论证和改 善公共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老 师本人作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其 思想指导了他的政治角色。如果老师告诉 学生哲学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公共文化, 然后证明人们不需要和公共文化有任何互 动,学生们将理所当然地询问为什么不,这 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当然, 现在的问题可能 有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人们可能发现, 个人能够为公共文化做出贡献的最好方法 实际上是当老师,培养未来的工作者和专 业人士以及政治家来思考有助于社会公平 正义的方法。人们也可能认为能体现哲学 在自己生活中的影响的最好办法是成为善 于思考的家长和公民,这些和专业哲学活 动没有多少联系,他们热心从事各种公民活 动, 热爱自己的家人, 用自己的部分收入从 事实现社会和政治目标的事业。

但是,我相信公共哲学还有能够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工作。这是柏拉图、亚里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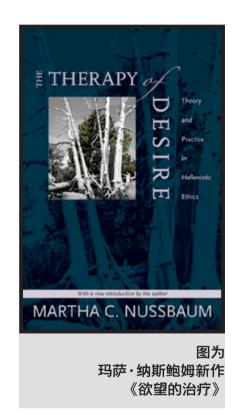


TRANSLATION

德、塞涅卡当时都试图从事的工作,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写作阐明对公众的紧迫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当今美国哲学教授很少从事的工作,也是自约翰·杜威和威廉·詹姆斯以来没有做好的工作。其中有一些原因:美国是一个反智主义的社会,市侩倾向严重,对任何自命的"文化精英"都抱着深刻怀疑的态度。因此很少有机构可以让美国哲学教授面向大众谈论问题,即使他们对大众讲了,也不会像德国、法国、英国的哲学家们那样受到认真对待。虽然如此,部分原因也归咎于哲学界本身,哲学家们的话语常常包含晦涩难解的术语,他们还没有学会和非专家进行交流的写作技能。

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因为我觉得我的最根本身份还是作家,那是我能够做的也知道该如何做好的事。担任公职不是我的强项,我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以贡献出来。如果我要为公众做贡献的话,通过我的工作找到办法当然最好。另一方面,我认为公共生活需要哲学思想,而现在还远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人们需要批评性思考和严密推理来展开有关人类迫切议题的辩论。所以我觉得,把我的部分工作投入到这个目标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说服我现在过的生活的合理性,心安理得地从自己的哲学教学和写作中得到满足和享受。

首先我要说的是为了个人的写作和为 了普通大众的写作之间的选择不一定是相 互排斥的或你死我活的。因为实际上,普通 大众渴望探讨伦理学和政治议题的哲学著



作,只要作品通俗易懂。哲学期刊的糟糕写 作质量是毫无理由的,这常常是懒惰的结 果,看似非常准确的架势实际上不准确。完 全有可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甚至感人至深的 文章让受到大学教育的大众可以兴趣盎然 地理解。因此,我总是尽量用通俗语言写哪 怕最具有学术性的专业著作。《善的脆弱 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本 不是面向大众的著作,该书有400页,100 多页注释,而且是小字印刷,里面充斥着引 用和注释,但实际上该书有相当多的非学 术界读者,它的惊人销量和我收到的各种 来信可以作证。(给我通讯的人甚至报告说 他们喜欢注释,因为这帮助他们确定就这 个话题寻找的其他材料,让他们明白辩论 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我写此书就是因为这

TRANSLATION

个问题很重要,我试图把它对我的重要性传达给读者,向读者显示我研究哲学的动机。我希望我最近完成的有关希腊伦理学的书《欲望的治疗》也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虽然这可能更困难,因为本书讨论的是人们更不熟悉的古典文献。

与此同时, 我把自己的部分时间用来 撰写直接面向大众的通俗文章。我们的公 共媒体使得这个任务很不容易: 书评或许 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唯一方式,如果刊登有关 哲学著作的深入讨论的话,很少有地方能 够让人的影响力超越学术界以外。《纽约时 报书评》的出现频率非常低,而且没有严肃 的思想讨论(它曾经让我写一篇600字的文 章评论福柯的《性史》、《纽约书评》、《伦 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及最近 的《新共和》文学副刊已经成为这些领域英 美公共讨论的主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 你是否被邀请为这些期刊撰写书评是偶然 之事。不过,一旦有人邀请,他就必须愿意 采取新的和积极配合的写作模式。这些编 辑不仅仅是发表作者写出来的东西, 无论 多么喜欢这个作家。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读者 能理解什么不能理解什么,因此对每篇文 章都有一个漫长的编辑和重新写作的过程。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这方面做得最少,因为英国读者普遍拥有共同的背景,学术水平相对高些。)这种做法对于珍视自己的文字的人来说最初肯定是令人吃惊和不快。但我已经学会充分尊重语言规范、读者的感受、《纽约书评》的鲍伯·西弗斯(Bob

Silvers)和《新共和》的里昂·维森特尔(Leon Wieseltier)等编辑的常识。

学者们有时候贬低这种活动,认为它们不过是新闻报道。但我可以向他们保证,就像好的本科生课程一样,这种文章要求对所讨论话题的更熟练的掌握和更准确的认识。通常我写这种文章时,手头摆放所有的材料和论证,都是长长的详细的学术评论,然后我必须询问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怎样把复杂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话表达出来?这个活动非常类似本科生教学,我认为,如果自己不搞哲学,他就很难把哲学讲好。同样的,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你就无法写出好的通俗文章来。

美国电视很少为严肃的思想讨论提供 机会。但当机会来临时,那是一个特别有回 报的接近大众的方式,比频繁地写作更接 近你的教学。我做过两次电视节目,一次是 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伟大哲学家》的系列节 目,谈论亚里士多德,一次是为公共广播公 司的"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思想 世界"节目。两次都让我获益很大,虽然方 式不同。第一次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节目 就像讲座和对话,第二次是更加深入的范 围广泛的即兴对话,里面谈到众多伦理学 问题。各有其优势,我认为每次都发挥了宝 贵的教育作用。如果我觉得没有机会进行 严肃的讨论和持久的辩论的话, 我就拒绝 到电视台做节目。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德国电 视台关于"美国哲学的倾向和传统"的系列 节目。我希望这个活动给我向新观众(通过

译介

TRANSLATION

会议) 谈谈我的新认识的机会。不过,这种 公共哲学活动有很多曲折和陷阱。回顾起 来,一个是人们花很多时间谈论并不值得多 谈的观点,仅仅因为如果不加约束,言论的 影响力有可能是破坏性的。花费一个多月 的时间考察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的思想(这里作者指此人的著作《美国思想 的封闭》——译注)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我也没有因此加深我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理 解。另一方面,批评他的书对公众来说还是 很重要的,如果这是思想牺牲的话,我觉得 花费这个时间是值得的。更令人担忧的危险 是电视学者可能被公众吞噬,失掉了自己作 为思想家的本分。一个人有必要尽一切可能 保卫自己免受时间和空间的入侵,如果不想 失去自我的话。有时候人们发现,成为名人 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曾经尽很大努力不把 电话公布出来,但在过去的3个小时时间里 我已经接到14个电话,我在写这篇文章的 一个句子时就有三个电话打进来。

除了时间问题外,还有个人形象问题。 公众世界希望把人装在整齐的套子里使其 成为媒体人物和表演艺术家。我认为你必 须选择:你想过那种生活还是想成为哲学 家?具体来说,我认为这意味着在你接受邀 请时千万要小心。(我拒绝上奥普拉·温弗 瑞(Oprah Winfrey)的节目和阿兰·布鲁 姆辩论)对发表的东西非常明智而审慎,要 确保它表达个人对理性的承诺,塑造严谨的 哲学家的形象。这并不意味着写作的时候 没有辛辣和诙谐,而是说不要听起来牵强 和教条。因为发表辩论性文章太容易不过了,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确保文章有积极的东西,表现出公平对待对手的精神。对你不喜欢的书嘲笑挖苦太容易了,但进行哲学上的批评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学界人士不要陷入美国政治常见的那种纯粹标语口号式攻击漫骂的泥坑。我非常高兴我的听众事先并不完全肯定我要讲什么东西,那些阅读过我的著作的人相信我不会说没有论证支持的话,相信我跟从论证指引的方向走。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发表我对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性与理性》的赞许性书评(《新共和》4月份那期)非常重要。在很多左派看来,波斯纳是右翼思想家所以根本不看他的论证。

(《纽约时报》上对这本书的评论就是一个非常坏的例子) 我仔细阅读了本书,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深入和细腻的著作,在很多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赞扬让很多左派朋友很不高兴,为此,我很高兴,因为如果一个人成为某种政治观点的代言人,在遭遇的每本书上都不加批评地采用政治观点评判,那他就不再是哲学家了。

五

我已经谈论了面向公众发言的问题, 但哲学家还有影响公共生活的很多其他方法。在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看到"应用伦理 学"的蓬勃发展,其中哲学家越来越多地与

译介 TRANSLATION

医生、律师、商人互动,讨论这些职业领域的伦理学问题。我的同事丹·布罗克(Dan Brock)就是我国医学伦理学的领袖之一,他做的工作(比如关于病人利益和病人自主权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生行为和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层次上的立法起草工作。他能够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仅仅因为他摈弃了不卷入的立场:他花费一年时间在当地医院考察,然后每个学期花费部分时间给医学院学生上课,与医生进行交流。这里,理论和实践以一种非常有成效的方式结合起来。

我自己参与的首先是法律领域。到现 在为止,我已经在法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演 讲和讲座。在1993-1994学年我将在芝加 哥大学法学院访问一个学期,讲授法律和 文学课程。当我发现接到法学院的邀请时 感到非常意外。我在想是什么促成了这种 事,不久我发现当今法律界对可以作为经济 学的狭隘理性描述的替代物的理性范式具 有浓厚兴趣。在这方面,他们一直求助于亚 里十多德,看了我有关亚里十多德的"非科 学思考"的著作。一旦进入法学院,我的反 对功利主义的倾向受到高贵的但影响很大 的职业场景所刺激,法律职业否认自己历 史洞察力的复杂性以便追求经济学功利主 义的极具诱惑力的伪科学的简单化。它的 对立面似乎是没有武装的: 那些认为拥有 众多无法衡量的善的人被贴上非理性主义 者的标签,而且接受了这个标签。那些认为 感情在道德推理中发挥作用的人被指控抛 弃了理性,而且承认了这种指控。我们显然需要做一些工作:说明理性是什么,也就是阐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考,解释为什么经济理性可能是非理性的。我越来越发现从事这个工作令人着迷,因为它好像与我的职业资格和兴趣十分吻合。

在很多情况下, 法律界人士只对付美国人生活的问题, 以学术界圈内人的方式对付这些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 因为这意味着通过讲课和出版等通常的学术界渠道, 人们实际上能够产生影响力。法官也读书, 至少某些法官读书。人们写的东西如果被法官阅读, 哪怕只改变一两个人的思想就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 我对法律界不是非常乐观。我认为像波斯纳这样的法官——有学术修养、思想开明、同情心——非常罕见, 无论在最高法院还是在低级法院都是如此。另一方面, 我至少希望通过在这方面的深入思考和写作, 用我所受的教育和禀性所写的作品带来某些变化。

我实际工作的其他领域的情景要复杂得多。这就是国际发展研究和政策制订领域。在过去7年里我一直是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研究顾问,这是一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研究机构,其功能是开发新的跨学科途径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我参与了一个课题,考察衡量这些国家"生活质量"的标准的不同方法。该课题旨在把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集中起来以便更进一步地阐明问题。我作为专门研究古代世界的哲学家的经验与当今发

译介

TRANSLATION

展的某些迫切议题以令人着迷的方式结合起来。提出建立在古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的衡量生活质量的途径,结合还有经济学中最杰出成果共同产生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情景是这样的。当政府想知道他们做 的工作如何或国际机构想弄清不同国家的 表现如何时,需要知道寻找什么标准。所以 他们需要某些判断人类幸福生活的概念, 以及最可能产生有关幸福生活的可靠数据 的方法。通常,经济学家提供的是随意的肤 浅的方式。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出 现的富裕(Opulence)是最常见的衡量标 准,但非常明显的是该标准甚至没有考虑财 富和收入的分配问题,更不要说提出如财 富和收入在推动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上发 挥的作用等更深刻的问题了。亚里士多德坚 持认为要了解一个城市的表现是否优秀, 人们必须不仅看一个阶级而且要看每个阶 级每个人的情况。他清楚某些特别有钱的 公民会剥夺最贫穷的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生 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洞察力,他的著作才 对马克思如此重要。

在复杂程度上更进一步,我们有了通过功效衡量生活质量的途径,即询问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该途径的好处是关注人本身和资源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但它忽略了对所有希腊哲学家都非常关键的事实:也就是人们的欲望不一定是说明什么对自己有利的可靠指标。富人和得到过分满足的人已经习惯于奢侈的生活,对他们可

能像别人一样的待遇可能表现出极端的不 满。穷人和被剥夺了种种机会的人逐渐适 应了所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在他们没有得到 教育的话,尤其是这些国家中受到传统观 念约束的许多妇女,往往是逆来顺受。我们 的课题是根据亚里十多德的人性论找到替 代这两种途径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政府应 该真正询问的是在人类生活的众多重要方 面,公民实际上能够生活得如何。该途径提 出了家长制的幽灵, 所以我们花费了很多时 间打败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证和当时流行的 客观性,试图认为对多元化和敏感性的合 理担忧并不破坏我们提出人性发展的普遍 规范。我们也重新修改了途径,使其对文化 多样性更敏感。考虑到生殖技术的新进步, 我们正在观察它对家庭和性行为的未来的 隐含意义。如果这个研究院的新主任(刚刚 当选的) 支持这种哲学途径, 我们将继续考 察在世界不同地区实际推行这个途径以实 际设计社会项目的工作。

这工作在我看来非常激动人心,但同时也十分令人沮丧。激动人心是因为我进入了一个多样的国际世界,其中哲学论证可能实际上解释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这些议题——尤其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有关的议题在我看来非常迫切,这使得我对很难取得进步感到十分沮丧。这些国家非常多,情况复杂,我们根本不清楚任何一个思想途径尤其是国际主义者的和世俗主义者的途径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不管怎样,影响力问题取决于我既不理解又不能控制的

译介 TRANSLATION

因素。主流经济学思想对类似的任何修改 都持非常坚定的排斥态度,即使在思想界 也存在公平听证的众多障碍。与此同时,哲 学家通常在这方面的文章写得不够好,没 有多大说服力。所以我希望在未来五年里, 我要写一本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广泛影响 的书,即使不能改变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即 便如此,政策实施仍然取决于政治,而政治 在如今越来越具有离心倾向和种族中心主 义倾向。我或许可以补充一点,这对世界上 的很多女性来说绝对是很糟糕的预兆。

在此,我或许已经偏离教学的话题太远了。但我相信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在某种方式上是在教室里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信念就在他的性格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中,也在遭遇到的可以用来阐释抽象道德观

点的迫切的伦理学和政治议题的人生经验 中。我知道,自己从在印度和赫尔辛基的工 作中对世界的了解改变了我给学生讲授希 腊哲学家著作的方式,使得我更能够在讲 授"西方文明"传统材料时追求世界公民的 目标。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成为热情地沉浸 在人生伦理学议题中的人,一个决不逃避 履行这些承诺所需的风险的人,同时是一 个热爱哲学,相信履行承诺的最好办法是 传授哲学推理和思考,并从这种活动中获 得快乐和幸福的人。我也希望我的学生成 为这样的人。伊壁鸠鲁说过"通过对哲学的 热烈的爱,什么样的人类苦难都可消除。" 这当然是讨分乐观的看法, 但把它当作指 导我们行动的理想和教学的"政治动机" 还是很不错的。◘

作者简介: 玛萨·纳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芝加哥大学哲学、法学教授



无产者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



鸣谢: 季风书讯

搜狐新闻

合作媒体: news.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